



第四卷 第一期

# 問題與研究

## 本期要目

- 毛匪澤東對黑魯曉夫的鬥爭中一個焦點：核子武器與核子戰爭……………陶希聖
- 美國兩黨的外交政策之比較……………陳紹賢
- 參加國際法學會東京年會紀事……………黃正銘
- 出席國際亞洲歷史會議報告……………張貴永
- 日本之修憲問題……………張棟材
- 國際貨幣制度與貝恩斯坦改進方案……………林霖
- 共匪所謂培養革命接班人問題之分析……………張敬文
- 蘇俄本年農業蠱測……………呂律
- 展望英國大選……………孫德湘

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

十月十日出版

# 目 次

毛匪澤東對黑魯曉夫的鬥爭中一個焦點：核子武器與核子戰爭

陶希聖 (1)

美國兩黨的外交政策之比較

陳紹賢 (3)

參加國際法學會東京年會紀事

黃正銘 (9)

出席國際亞洲歷史會議報告

張貴永 (11)

日本之修憲問題

張棟材 (18)

國際貨幣制度與貝恩斯坦改進方案

林霖 (22)

共匪所謂培養革命接班人問題之分析

張敬文 (28)

蘇俄本年農業蠶測

呂律 (32)

展望英國大選

孫德湘 (36)

最近蘇俄黨政活動與人事調整之分析

關素質 (40)

非洲國家組織的第二屆高峯會議

湯德衡 (45)

俄共對共匪文藝政策與觀點之批判

王啟升 (48)

俄帝動態述評

一心 (52)

① 黑魔視察各地農業。

② 加強家禽業生產。

③ 增加供應印度武器。

④ 給予阿聯巨額經援。

⑤ 對外其他活動

每月大事記 (國際・敵情)

編後記

編者

# 毛澤東對黑魯曉夫的鬥爭中

## 一個焦點：核子武器與核子戰爭

陶希聖

在毛澤東對黑魯曉夫的鬥爭中，核子武器與核子戰爭可以說是他們雙方鬥爭的一個焦點。關於核子武器與核子戰爭的鬥爭，有理論的與實際的兩方面。

### 一 毛匪的核子戰爭與廢墟論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北平「人民日報」發表「陶里亞蒂同我們的分歧」這篇論文，提出了核子武器與核子戰爭的見解。一九六三年「紅旗」雜誌第三期和第四期合刊，發表「再論陶里亞蒂同我們的分歧」。這一長篇論文對於核子武器與核子戰爭，依據史達林一九四六年的見解，認為原子彈「不能決定戰爭的命運」。這篇論文指出那「以為使用核子武器就可以迅速解決戰爭勝負」的理論，不過是帝國主義者的「核子詭詐」，並且斥責「現代修正主義者」「大肆吹噓這種理論，用以恐嚇各國人民」，乃是「替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他帝國主義者效勞」。

毛澤東依據史達林的見解，把核子武器當做一般武器中的一種武器。核子武器與核子戰爭並不能改變社會規律，「只要社會還分成階級，只要人剝削人的現象還存在，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在這一觀念之下，這篇論文為毛澤東的「廢墟論」，加以辯解。原來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演述「一切反動勢力都是紙老虎」的理論的時候，曾經說過「是否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戰爭爆發，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即不過九億人。……如果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但是帝國主義將要被完全消滅，全世界只有社會主義，而過半個世紀或二個世紀，人口又會增加甚至超過一半」。

一九六〇年「紅旗」第八期，「列寧主義萬歲」論文裏，毛匪又說：「如果帝國主義把這種犧牲硬加在各國人民頭上，我們相信，正如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經驗一樣，這種犧牲是會得到代價的。勝利的人民在帝國主義死亡的廢墟上，將會以迅速的步伐，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創造自己真正美好的將來」。

「再論陶里亞蒂同我們的分歧」論文對於毛匪這一理論，援引馬克思列寧主義，力加解說。它說「如果這些人讀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就會知道，在舊制度的廢墟上建立新制度，本來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提綱。」

### 二 毛黑鬥爭中關於核子武器的實際問題

毛澤東對抗黑魯曉夫的理論鬥爭之底流乃是一些實際問題。毛黑鬥爭中關於核子武器的實際問題是什麼？

毛匪對黑魯曉夫指責他做了下列兩件事：

(一)「一九五九年六月，蘇俄政府片面的撕毀了中蘇雙方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中國（即中共）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

(二)「一九六二年八月間，蘇俄政府正式通知中國（即中共）說：蘇俄將同美國達成關於防止核子擴散的協議。」（以上均

毛澤東對黑魯曉夫的鬥爭中一個焦點：核子武器與核子戰爭

見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中共聲明「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與發展」。一九六三年七月至八月間，蘇俄與英美簽訂了局部禁試條約。於是毛匪對黑魯曉夫，更加猛烈的展開全面的鬥爭。毛匪在「八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題目是「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明白確切的指責「蘇美合作主宰世界，是蘇共領導的和平共處總路線的靈魂。」

毛匪並且公開指責局部禁試條約達成協議是黑魯曉夫向美國「投降」。他說：「在蘇共領導的心目中，只看得起一個美國。爲了追求美蘇合作，蘇共領導不惜背棄蘇俄人民的真正盟友，不惜背棄至今還處於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弟兄以及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

毛匪再進一步指責黑魯曉夫「揮舞核子武器並不是真正爲了支援各國人民的反帝鬥爭」。毛匪指責黑魯曉夫的「核子訛詐，一旦被對方識破，並且遭到對方的反訛詐，就馬上節節敗退，從冒險主義滾到投降主義，在核子賭博中，輸得精光」。

### 三 毛匪「戰爭解決問題」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日，「八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裏，毛匪澤東公開的、正面的，提出「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和「戰爭解決問題」的提綱。他的依據仍然是史達林主義。他說：「沒有暴力革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對資產階級的制度進行根本改造呢？史達林回答道：顯然是不能的。」

他說：「在階級社會中，革命與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又說：「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

毛匪所指的戰爭，是包括核子戰爭在內的。「八評蘇共中央的信」未曾特別提出核子武器與核子戰爭的毛匪見解。

### 四 匪俄盟約無價值

一九六四年六月三日，莫斯科「消息報」指責中共「外交部長」陳毅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表示「蘇俄與中共一九五〇年簽訂的友好同盟條約是無價值的」。消息報指責中共已使它自己與蘇俄集團脫離，不再認爲它自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份。

六月二十九日，消息報又發表蘇俄參加日內瓦裁軍談判首席代表左林的論文，指責中共不顧蘇俄「原子傘」保護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事實，一意孤行謀求獲得核子武器，左林在論文中表示蘇俄對於「背棄列寧和平共存原則的國家」，將不給予飛彈與核子保護。

### 五 戰爭、新武器、邊疆問題

九月十五日，黑魯曉夫對日本議員訪俄團談話中，提到蘇俄持有「足以毀滅人類的無限威力的武器」。這一宣佈以訛傳訛，使世界爲之震驚。十九日，塔斯社發表一篇更正的通訊。

原來毛匪澤東不久以前，對一個日本社會黨訪問團談話，表示他支持日本要求蘇俄交還千島羣島。毛匪又說百年之前，貝加爾湖以東及新疆西北的中國領土被帝俄佔領。莫斯科「真理報」爲此發表社論，指責中共對於西伯利亞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有問鼎之企圖。到了九月十五日，黑魯曉夫接見日本議員訪問團，便提到新疆，並進而表示蘇俄將以武力維護它的邊境，他說：「如果一個戰爭加在我們之上，蘇俄將以所有的力量和手段作戰。蘇俄持有無限威力的武器。」

黑魯曉夫這一含有恐嚇作用的談話，可以看做他對於毛匪澤東「戰爭解決問題」的回答。中共與俄共之間，關於核子武器及核子戰爭的鬥爭，至此已達到最高峯。

# 美國兩黨的外交政策之比較

陳紹賢

兩黨的外交政策雖多迥異，但其主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對共產侵略的本質認識頗不相同，故主張亦不一致。

今年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政綱中外交政策之懸殊，為歷來所罕見，已引起舉世的重視。本文根據各種正式文件，作客觀的研究。對兩黨各項對外政策，分別比較，并剖析其錯綜複雜的原因，而歸結到差異的主因，在於反共的意識迥然不同。

## 壹 前 言

今年是大選年，共和黨和民主黨已先後舉行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政綱，推選出下屆總統和副總統的候選人。

就過去的史實看，美國兩大黨每四年一度的政綱，每以爭取選票為唯一目的，多方顧慮選民的心理反應，故所揭櫫的政策，往往意旨含糊，措詞曖昧，以便作兩可的解釋，有利於全面的號召。此種情形，誠如哈佛大學故校長羅威爾（Abbott D. Lowell）所說的：「這些競選政綱（Platform），正像火車站的月台（Platform），可供往左或往右。」直到最近，一四年前的競選政綱，大致還是如此。美國名政論家艾索浦（Stewart Alsop）說得好：「一九六〇年共和黨的政綱，還是依循『爭取一切選民』規則的最好例證。政綱中有強烈的民權條文，既有討好自由份子的聯邦政府補助教育的條款，也有討好工會的反對『工作權』法。」（註一）

可是今年共和民主兩黨的政綱已非同小異，而是大異小同了。而且所異的，不只是程度上之異，並且有實質上之異。對此，

美國兩黨的外交政策之比較

「紐約時報」曾一再發表社論，對共和黨政綱表示驚異，認為它「將使美國逐漸離開她的朋友，而面對她的敵人，作直接的軍事對峙。」（註二）又對於兩黨的政策那樣差異，指稱為「三十年來所未有」；且以共和黨的政策為圖推翻美國兩黨共守的基本原則。（註三）美國某雜誌則以兩黨政綱的極端對立，為一九一八年以後所僅見。

其實所謂「三十年來所未有」，當從羅斯福首次當選總統後算起。當時兩黨的主要政策分歧，只集中於經濟復興與政策——內政政策而已。再所謂「一九一八年以後所僅見」，是指當年兩黨對凡爾賽條約批准與否之爭。那只是對一項外交政策的對立。今日兩黨政綱所宣告的對外政策，都有顯著而極端的殊異，這是南北戰爭後所罕見的事實。兩黨政綱——尤其是共和黨政綱發表後，受美國國內的空前重視，熱烈批評，其原因也在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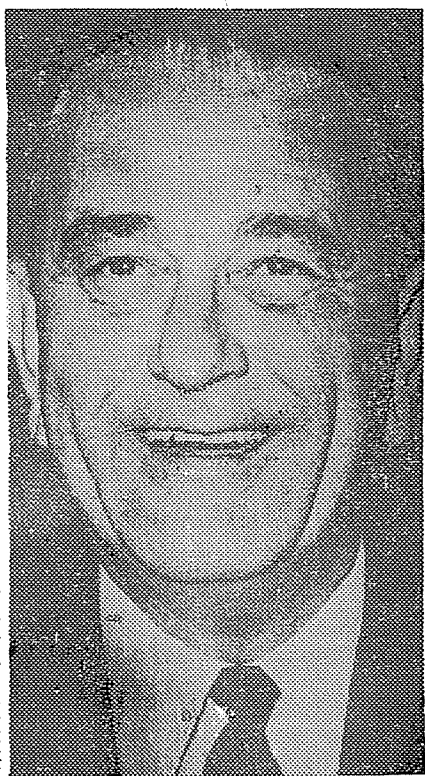
當過去兩黨政綱差別不大的時代，總統競選人底人的因素，每為選民抉擇的唯一因素。今年兩黨的內外政策已如此的對立，選民的反應如何，對大選的投票當有影響。誰將當選總統？他對他們的政綱能實行至何種程度？都是題外的問題。目前兩黨的對外政策截然不同，當為一般研究國際政治者所注意。筆者本於研究的興趣，試就兩種政綱的內容，參證以有關的資料，作兩黨的外交政策比較，以供同好的參考。

本文所稱的「外交政策」，是廣義的，即「對外政策」。但因用於政黨，前一名詞較為合乎習慣。

## 貳 外交政策的個別比較

### 一 古巴問題與拉丁美洲之防共

古巴問題將成爲今年競選中的重要事件，早在許多評論家意料之中。例如，在前年出版的「保守主義先生——高華德」(Mr. Conservative: Barry Goldwater)一書中，著者貝爾(Jack Bell)敘述了前年古巴危機期間，高氏對白宮措施的支持、批評、乃至挑剔的情形之後，就認定共和黨將以古巴問題爲一九六四年競選的事件。(註四)



森 詹人選候統總黨主民

民主黨人也早已有此警覺，他們兩年來對孤立卡斯楚政權而爲的努力，一天的加強。最近從促成美洲國家組織「制裁」古巴的強硬決議，到獲得巴哈馬政府的支持，打破了哈瓦那與拿梭間的飛行計劃，達成這項「空中孤立卡斯楚」的企圖。這些努力，當也爲着大選的緣故。在這種背景下，讓我們先看看兩黨政綱中對古巴政策的距離。

(一)民主黨：「以主動的行動，去實施美洲國家組織的決議，

使卡斯楚主義更形孤立，并加速古巴境內自由與責任的恢復。」(註五)

(二)共和黨：「我們要力促美洲國家組織各國與美國聯合一致，去恢復一個自由獨立的古巴政府；阻止匪俄顛覆的蔓延；迫使現在駐留拉丁美洲的外國軍隊撤出，及防止其再進入。我們必須承認一個流亡的古巴政府，并支持它爲光復祖國而爲的努力；我們願意幫助古巴的自由鬥士，繼續游擊作戰，以反抗共產政權。」(註六)

古巴自卡斯楚政權共產化之後，成爲匪俄滲透顛覆拉丁美洲國家的基地。近兩年來，民主黨政府對拉丁美洲的防共政策，以實施「進步同盟」(Alliance For Progress)計劃爲其中心。此次它的政綱中此項政策，是重申它的現行政策。共和黨的此項政策，則有新的主張。

(一)民主黨：「在進步同盟計劃下，支助自由美洲各共和國的合作關係。」

(二)共和黨：「在西半球建立一種強化的聯盟體系，有其同等的需要。」(按：所謂「有同等的需要」，是與已成立的北約組織、東約組織及中約組織的對比而言。)(「我們決意催促立即實施一九五四年美洲國家組織通過的『團結反抗國際共產干涉』宣言(註七)……這宣言符合門羅主義的政策。」)

這第二項表明共和黨的西半球政策爲繼續門羅主義的傳統。這是高華德的一貫主張。在貝爾的書中，有一段記述，可以參證。他說：「在一九六二年選舉前，高華德發表的聲明中，問甘迺迪總統已否把門羅主義當廢物丟棄了嗎？甘氏忽視不答。」(註八)今日如以門羅主義去比量民主黨政府的古巴政策，或整個的拉丁美洲政策，則其相去之遠，可想而知。

### 二 「柏林自由」與德國問題的談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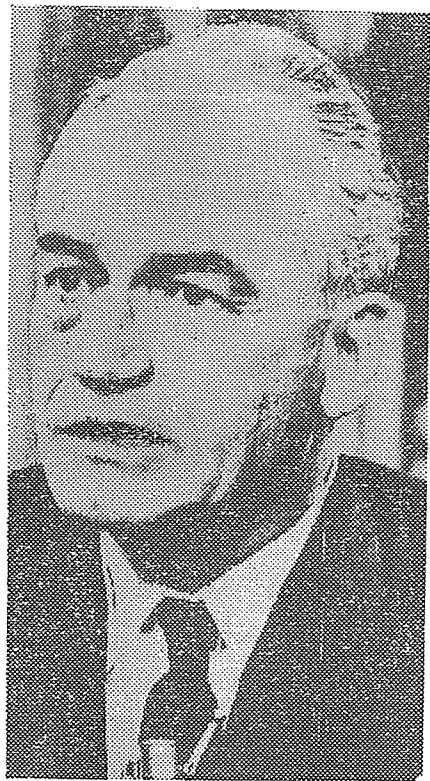
(一)民主黨：「我們保證忠實不渝地實踐維護柏林自由的承諾。」

(二)共和黨：「我們要求與蘇俄恢復任何在德國境內的軍隊地

位談判或涉及德國的條約談判之前，柏林圍牆必先拆掉。」我們願再度明告我們的德國朋友們：美國將不接受涉及德國的將來之任何方案——凡缺乏確實保證以自由選擇達成德國統一之方案。」

兩黨的此一政策，範圍與性質都不同：民主黨僅強調保證柏林自由，對其他德國問題無所表示；共和黨以拆除柏林圍牆為與俄恢復談判德國問題的先決條件，并以「自由選舉達成德國統一」，為涉及德國的將來地位之方案基礎。

### 三 對於共黨奴役下之人民與國家



德華高人選候統總黨和共

(一)民主黨：「用所有的和平方法，鼓勵共產主義下被奴役人民獨立運動的成長，并加速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東德、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等被奴役國家早獲完全自由與自決。」

(二)共和黨：「我們重申領導共產統制下東歐、亞洲及拉丁美洲各國達成最後解放的承諾。這些國家或人民包括：匈牙利、波蘭、東德、捷克、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阿明尼亞、烏克蘭、南斯拉夫、古巴、中國大陸等。」

### 美國兩黨的外交政策之比較

比較起來，不但政策的對象多寡與範圍廣狹都不同，而且政策的性質顯有重大的差別。民主黨要用和平方法鼓勵獨立的成長；共和黨是重申實行解放政策，去達到最後的解放。

共和黨這一政策，參證以高華德的有關說明，可見它較之艾森豪執政初期的解放政策，更加廣大而堅強。高氏在所著的「一個保守主義者的良知」(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中說：

「我們必須鼓勵被奴役人民，去反叛他們的共產統治者。……為此目的，我們必須與鐵幕後的地下活動領袖們建立密切的聯絡，供給他們全面抗戰的一切裝備。」

「我們必須鼓勵與支持自由中國人民在中國大陸上的游擊作戰。如果此種情況發展有利，我們應鼓勵南韓及越南與自由中國的軍隊，聯合一致，共同努力，去解放亞洲的被奴役人民。」(註九)

### 四 越南戰爭、有限戰爭、顛覆活動

(一)民主黨：「我們保證忠實不渝地實踐維護越南自由的承諾。」「進一步地加強我們的實力，以阻遏有限戰爭與對抗顛覆活動。」

(二)共和黨：「我們願以決定性行動，以保證越南的勝利。」「我們必須使共產世界明白知道：當美國被迫與之衝突時，只有為自由的勝利，才終止那種衝突。」「我們必須使全世界的共產黨人都知道：你們現在支持的或計劃支持的游擊與顛覆活動，凡從事此種破壞世界和平的人們，今後將不復有庇護所了。我們將施以必要的反擊，如封鎖、截斷後勤供給、外交與經濟壓力，以對付那些蓄意破壞和平的行動。」

兩黨對於對方的這項政策，都作相互的抨擊。共和黨以越南局勢每况愈下，歸咎於民主黨政策的錯誤；民主黨以共和黨此種政策足以導致核子戰爭。

為甚麼共和黨此一政策被看得那麼嚴重呢？據外電傳稱，高華德曾對美國「展望雜誌」記者說：在叢林地區(指越南寮國一帶)



作戰，可考慮使用小威力的核子武器。這種傳說，還有其他的根據。在上面提過的高氏的書中，他一再主張對有限戰爭，準備使用小型核子武器。他也說明，沒有只用防守戰略的國家，而可望長久生存的。所以他認為對付共黨的侵略戰爭，有須作過境的還擊，以解放該地區的人民。(註十)

### 五 北平匪偽與匪俄衝突

對於北平匪偽，兩黨的政綱仍同樣地反對它進入聯合國。不過共和黨的條文還涉及其他：

- (一) 民主黨：「我們繼續反對共產中國進入聯合國」。
- (二) 共和黨：「我們反對承認共產中國。我們反對它進入聯合國。我們堅定地支持自由中國。」

對於匪俄衝突，民主黨政綱沒有提到。共和黨政綱有這樣的說：「我們反對這種觀念——認為肥胖與餓得好的共產黨人比較消瘦飢餓的共產黨人減少危險。我們也反對另一觀念，以為美國對匪俄衝突須採取偏袒的行動。」

這項政策，對民主黨政府的現行政策是一種挑戰。現政府的對俄政策，本於甘故總統的「和平策略」(A Strategy of Peace)，企求與之「和平共存」。它的對匪政策，則基於另一觀念——匪偽是好戰主義者。因之，它對匪俄衝突，就有了偏袒的意識。

### 六 北約組織須加強抑復興

(一) 民主黨的政策是要加強它：「我們願由各種可能的途徑，從事加強與北大西洋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使建立在北大西洋公約的穩固基礎上的團結與合作，更加堅強。」

(二) 共和黨的政策是要復興它：「我們認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防止戰爭與保衛自由之所必需。它在現政府的做法下，它的和協與活力已有可驚的退步。使此聯盟復興，為共和黨外交政策的一塊基石。」

在共和黨看來，北約組織已是退步，并把那退步的責任，歸諸

於民主黨政府，而聲稱要復興它。民主黨只默認北約組織不够堅強，所以要儘可能去加強它。

### 七 聯合國須增強抑改造

(一) 民主黨：「我們決維持對聯合國及其組成的各機構之莊嚴承諾。從事於增強它，使它成爲一種更有效的工具，以維護和平，防止或解決國際爭端，以及透過經濟的、技術的、文化的發展，去建立自由的國家。」

(二) 共和黨：「我們支持聯合國。然而我們決以不停的努力，去使它的原始宗旨復活起來。」

充實和增強聯合國，促成一個國際法治的社會。這原是甘氏「和平策略」所要實現的一種理想。民主黨此項政策符合他的遺志。共和黨對於復活聯合國的宗旨，提出若干改造它的主張，如改變聯大等的投票方法，停止欠費會員國的投票權，召開修憲大會，進行修憲。(註十一) 如果我們參證以高氏的書，更可了解這些主張的目的，在於打擊共產國家對聯合國的陰謀。(註十二)

### 八 對外貿易問題

(一) 民主黨：「在一九六二年的擴展貿易法下，鼓勵與世界各國擴大經濟的結合，消除不公正的關稅及非關稅的障礙。」

(二) 共和黨：「我們認定與共產國家貿易，不應使其力量與影響增強，只可使其勢力減少，才是合理的。」

「共產侵略的行動，包括對德國空中走廊的干擾，將爲我們重估與之貿易或外交關係的根據。這些關係，現在是對共黨有利的。」

民主黨的這項政策是籠統的——對自由國家與共產國家不作區別的政策。實際上，華府對於共產古巴，是在加強實施貿易封鎖政策。對於不接受勸阻，而繼續與古巴貿易的國家，如法、英、西、南、摩等五國，美國已予停止軍經援助，以爲報復。除此之外，「美國政府正在切實研討與若干共產國家擴大貿易的可能性。」(註十三)



共和黨的這一政策恰與相反。它顯然地把貿易作反共的一種手段。

### 叁 外交政策的意識比較

#### 一 關於反共產侵略

民主黨政綱中對於反共產侵略，只作如此含蓄地說：「反對對任何國家侵略，及使用武力或恐嚇使用武力。」

在共和黨的政綱中，很明顯的說：「我們反對這種觀念——認為共產主義已放棄其統制世界的目標。」又說：「共和黨的外交政策開端於這種假定：共產主義在各種意識上都是美國的敵人，除非它能證明它的對美敵意已經拋棄。」又說：「我們的恆久信心，就是與全世界的自由人類共同努力，求達成共產主義的失敗與自由的勝利。」

民主黨政綱裏并無反共侵略的明文。上面譯述的那一句，為政綱全文中唯一含蓄此義的一句。因為它究竟反對誰侵略呢？沒有明白說出，就是把侵略的主體——「共黨」含蓄下去。此與詹森的接受提名演說中沒有提到共產主義，是同樣的用意——不明白說出，避免直接刺激對方。這純出於維持和平的苦心。

原來詹森總統的對俄政策也如甘故總統一樣，抱着與俄「和平共存」的希望。他屢次的公開說話，常常這樣的表明過。例如，今年四月十二日，他在記者會上說：「我非常高興看到黑魯曉夫能担任和平角色，并設法尋求保持世界和平。這種做法，也確符合我們國家利益的要求。」四月二十日，他在紐約編輯人年會上說：「今日世界已出現一種新的壓力，新的現實，使得我們可以希望，追求和平不僅合乎我們的利益，同樣也合乎蘇俄的利益。」因此之故，最近他更聲稱：「只要我在總統任內一天，我所發表的每一談話，所表現的每一動作，都將絕無觸動戰爭的意味在內。」（註十四）共和黨則在意識上剛與相反。因為它否定能與俄「和平共存」的。也就是因為它認定「共產主義沒有放棄其統制世界的目標。」

美國兩黨的外交政策之比較

關於此點，高氏的書中一再強調地說：「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在征服世界。這是許多人說過的話。我再說出來，因為它是關係我們了解東西衝突之全部知識的話。」（註十五）

#### 二 核子武器使用問題

兩黨對此問題的歧見，一是關於核子武器使用的控制權；一是關於某種核子武器使用的對象。民主黨的政綱載稱：

「核子武器使用的控制權，必須單獨地屬於國家最高的民選官吏——合眾國的總統。」

這種規定是符合美國現有的制度。使用的控制權既屬於總統一人，那末，什麼核子武器可否使用於什麼對象，也就只有總統才能決定了。

共和黨政綱對此問題，沒有明文。但外電傳稱，高華德曾在該黨全國代表大會時說過：如果他當選總統，他將進行修改唯有總統才可決定使用核子武器的規定，并准許北約組織聯軍統帥如遭受攻擊，可自行決定使用。又上面已提過，他曾對記者說，在越南和寮國一帶作戰，可考慮使用某種核子武器。

對於高氏這種主張，民主黨人曾作強烈的攻擊。最近詹森總統在西雅圖演說，也似是針對此點。他說：總統不能把控制使用核子武器的責任分給任何人。一次全面的核子戰爭，可能殺死三億人命，及威脅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生存。（註十六）

高氏作上述主張的主要理由，在求反共作戰的全勝。依他的看法，與人力強大的敵人作戰，除非你能主動地選擇作戰的時間、地區和武器，必無制勝的可能。在他的「一個保守主義者的良知」和「為何不求勝？」（Why not victory?）兩書中，對此理由，反覆闡明；同時指責民主黨的「不求勝」政策，在意識上是謬誤的；實施下去，會引誘敵人的無壓野心，結果大戰反而無法避免。最近他在家鄉演說稱：

「我們了解敵人的目的。我們了解當我們表現軟弱時，就會引誘他去冒險地追求利益。過去往往如此，今後也將常常如此。」（註十七）

肆 結 論

綜括以上的比較研究，可見今年民主共和兩黨的外交政策，實是在大相逕庭。

民主黨是執政的黨，值此大選之年，既須表明現行政策的績效，以博取選民的同情，(註十八)也須對新政策的構想與措詞，特為小心與謹慎，使能維繫選民的信心。因之，它就像處於一種防守的地位了。尤其是關於外交政策之提出，因年來國際情勢急激變動，集團關係錯雜混淆，難於表現新的做法，以作新的號召。加以古巴問題像個死結；越南局勢危機日增；北約組織已是貌合神離，甚至瀕於難渙。對於這些政策，無論如何表達，當難適應輿情。這都是民主黨的弱點，也就是共和黨的優勢。

從另一方面看，共和黨政綱對核子武器問題雖持緘默，但高氏的主張，經民主黨人的集中攻擊，可能引起人民一種感覺，以為共和黨當政或能觸動大戰。這點是共和黨的不利，也就是民主黨的有利攻勢。

兩黨對外政策的顯著差異，歸根到底，乃發生於對共黨的基本認識懸殊。實行了「和平策略」的民主黨，它希望與蘇俄可以「和平共存」，所以一面極力避免對俄刺激的言論或行動，一面力謀與之談判各種問題。又因為它認定蘇俄是「有」的共產主義者，對內以求經濟的發展，對外在求國際地位的保持，在此情勢下，可不致發動世界戰爭。同時，民主黨認為北平是「無」的共產主義者，他們為解決內部困難，對外實行贖武主義，可能到處發動戰爭。基此認識，民主黨人對於匪俄衝突，就不免有左右袒的看法。

共和黨不信俄共或匪共會放棄征服世界的目標，同時認為共產主義在任何意識上都是美國的敵人，所以對每一對外政策都以反共為骨幹。共和黨也認定凡共黨無論是「有」的或「無」的，都同樣有威脅世界和平的危險，所以它對於匪俄交惡，不主張作左右袒。

總之，兩黨的外交政策雖多迥異，但其主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對共產侵略的本質認識頗不相同，故主張亦不一致。究竟美國人民的反應如何？當以本年十一月三日選民投票結果而決定。

- |     |  |
|-----|--|
| 註一  | Saturday Evening Post, Aug. 15, 1964   |
| 註二  | Editorial, New York Time, July 16, 1964  |
| 註三  | 同十 Aug. 26, 1964   |
| 註四  | Jack Bell, Mr. Conservative: Barry Goldwater, p.p. 138—141   |
| 註五  | Official text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platform: A Nation, A People. 政綱部分亦刊在 U. S. News & World Report, Sept. 7, 1964 |
| 註六  | Official text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Platform,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27, 1964                             |
| 註七  | O. A. S.'s Caracas Declaration for Solidarity, 1954  |
| 註八  | Jack Bell, op. cit., p.141   |
| 註九  | Barry Goldwater,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 p.p.123—124   |
| 註十  | 同十 p.p.96—122  |
| 註十一 |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27, 1964. P.114  |
| 註十二 | Goldwater, Op. cit., 114—116   |
| 註十三 | Secretary of State Rusk's testimony.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March 13, 1964                              |
| 註十四 | President Johnson's remarks at Texan Reporters Conf., July 18, 1964(CNA—UPI)   |
| 註十五 | Goldwater, op. cit., P.91  |
| 註十六 | President Johnson's speech, Seattle, Washington, Sept. 16, 1964(CNA—UPI)   |
| 註十七 | Goldwater's text of address, Prescott, Ariz., Sept. 3., 1964. U. S. News & World Report, Sept. 14, 1964              |
| 註十八 | A Nation, A People 中的 Accounting of Stewardship, 1960—1964 就是為此作用。   |

# 參加國際法學會東京年會紀事

黃正銘

國際法學會成立於一八七三年，總會設於英國倫敦。筆者在倫敦大學畢業後，一九三六年即加入為總部會員。百餘年來，年會均在歐洲舉行，其在美洲者亦有數次。東方集會，實以本年為首。蓋國際公法為歐洲文明的產物，東方國家，如中國、日本、泰國，在二十世紀以前，均未認為在其適用範圍之內。日本自二次大戰後，復元迅速，浸浸然有執國際牛耳之野心。對於國際集會，均願為地主國，盡其招待提倡之責。本年除國際法學會外，如即將開幕的世界運動大會，與結束不久的國際貨幣基金會等，皆其例也。

國際法學會年會，定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舉行，筆者本擬十五日啓程，乃當日因旅客擁擠，未能成行，及次日下午到達東京，則第一次全體理事會及日本分會招待會，均不及參加矣。當日寓新橋第一旅館 (Daichi Hotel) 三〇三六室，位於東京心臟地帶。

東京予人甚深的印象，為其繁榮與雜亂。東京為世界第一都會，到處大興土木，馬路多鋪木板，因地下鐵道正在擴建，深恐馬路陷落騷擾行旅，故在鋼骨水泥未凝固時，特為此種設備也。又日本憲法廢棄軍備，故人民負擔較輕，生活水準得以提高。所見男女，無不衣履整潔，儼然大國民的風度，甚可喜也。東京建設，在減少時間上甚為注意。如由羽田機場至東京市內，向須一小時以上，現則快速公路，另闢途徑，架空而起，四線行車，約十五分鐘可達。尚有羽田線的單軌電車，時速可達一百公里，不日即可通車。

國際法學會第五十一屆年會，在東京工商會議所 (The Tokyo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Building) 及東京會館

參加國際法學會東京年會紀事

- (The Tokyo Kaikan Building) 舉行，八月十七日開幕，至二十二日閉會，到會者三十二國代表六百餘人，日本人與會者一百五十餘人。到會代表，均為各國大學教授、各級法院法官及律師。在此一周中，計舉行討論會上下午共十三次，討論題目如左：
- 一、國際法院的強迫管轄權 (Compulsory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 二、國際河流利用問題 (Uses of the Waters of International Rivers)。
  - 三、庇護權的法律問題 (Legal aspects of Problems of Asylum)。
  - 四、限制貿易立法的適用問題 (Application of restrictive trade Legislation)。
  - 五、外國裁判執行問題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 六、和平共存的法律問題 (Juridical aspect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 七、家族關係 (子女收養問題) [Family Relations (Adoption of Children)]。
  - 八、國際醫學法 (International Medical Law)。
  - 九、太空法 (Space Law)。
- 年會中會就同一問題舉行討論會二次者，有太空法、國際河流、國際法院的管轄、限制貿易的立法等。此項議題皆由理事會通過，每一專題，指定小組委員會人選，及主席報告員 (Rapporteur)。

(六) 在歷屆年會中討論，作成決議。向例皆由討論會通過接受報告員所提研究報告，惟本年對於此項決議則有出人意料之發展。和平共存法律問題報告員南斯拉夫米羅教授 (Professor Milos Radonjkovic) 所提報告書，經討論會到會會員推翻另擬。此為美蘇兩國觀念衝突的結果，為學術機構不能免於政治色彩的一個證例。蓋本題於一九五六年南斯拉夫都魯夫尼克 (Duhrovnik) 年會中提出，歷經迭屆年會討論，報告書中列舉有關和平共存的十六原則。美國會員恐此案通過足為蘇俄宣傳工具，活動反對，甚為積極。但在小組委員會中，美方意見，係屬少數。及討論會舉行之時，美國學人幾於全體到場，待機辯論。不料當日討論會到會會員，對於原報告書亦表反對，乃通過決議，改組委員會，將「和平共存」名稱改為「國際安全與合作」，原報告書僅作未來參考之用，並將此項結果通知聯合國有關機構。美國方面終於制勝。筆者因此趨賀美國分會小組委員會召集人赫柴教授 (Professor John Harzard, 哥倫比亞大學公法教授)，彼亦甚為喜慰，並以俄人主張另選小組委員為異。

另一對報告員意見不滿的決議，為關於庇護權的法律問題。本題報告員為馬來亞大學格林教授 (Professor I.C. Green)，他在報告中說，國際法上庇護權根本並不存在。到會的若干南美洲國家會員，對於個人在國際法上享有庇護權以確立人權的保障，則為深信不疑，因而推翻格林的報告，決議命令委員會起草關於領土及外交庇護的若干原則，以供下屆年會討論。

三為關於太空法的決議，即決議不止一件而為七件，亦屬出人意料，即：

(一) 為推護聯合國大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所通過關於太空活動的若干原則。

(二) 為確認國家空間上層的限制，在此空間各國飛行機器，可無害航行。

(三) 為國際組織或各國所有太空船的法律地位，

(四) 為關於太空船所生損害的賠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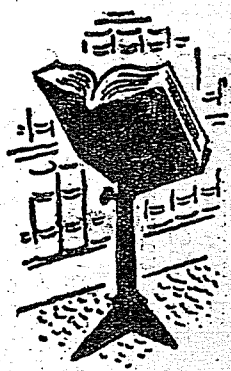
(五) 為協助太空人及太空船歸還原地一項國際協定的擬議，

(六) 為關於國際太空署組成專門機關的問題，

(七) 為衛星傳播和交通問題決議案。

國際法學會年會，除大會及討論會外，尚有每日招待及旅行日程的安排。日本分會會長栗山先生曾以英金一萬八千鎊補助倫敦總部人員旅費，復據西京大學教授田畑茂先生見告，日本外務省曾捐助日幣五百萬元，以充經費。故年會進行甚為順遂。年會首日，為東京市長及外務大臣椎名悅三郎在椿山莊的招宴。次日 (十八日，星期二) 晚間，為法務大臣在迎賓館的餐敘。八月十九日 (星期三) 赴東京市外日光旅行，先乘巴士至淺草車站，改乘火車至日光 (巴士火車皆裝冷氣，此在日本甚為普遍)，遊覽有名的東照宮，桁樑復疊，朱紫爭妍。午由栃木 (Tochigi) 縣知事招待便餐。二十日下午，應日本廣播公司 (NHK) 之邀，參觀表演節目，來賓大脫。二十一日 (星期五)，赴郊外東芝電工廠參觀，東芝為日本三大電工廠之一，歷史悠久，產品遍及世界。晚間日本分會舉行送別宴會，各國代表皆盛裝而至，有著禮服者，揖讓進退，甚為隆重。次日為年會最後一日，筆者出席全體理事會，韓國代表要求設立分會，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麥克圖古 (Professor Myres MacDougal) 發言支持 (此為筆者所見麥教授惟一發言)，我國亦表贊成，卒舉手予以通過，其代表申東旭、白道光、李漢基等皆來道謝。回想一九六〇年漢堡年會中，我國申請設立分會，當時北平尚為團體會員，環境險惡，筆者單槍匹馬，幸未辱命，不勝神往 (經過情形見拙作歐遊紀略，載中國一週五四八期)。下屆年會，有芬蘭、阿根廷、及英國邀請，理事會對此，擬稍遲再作決定。旋舉行閉幕典禮，將討論會各項決議均予通過，年會一週會期，乃告終結。

中日兩國，壤地密邇，國人在日居留者甚多。筆者初至因會務倥傯，來訪友好均不能相值。年會閉會後，始能略事自由遊覽，每日排定日程，得以登臨東京塔以遼望四野，漫步淺草區以訪問佛寺，窮銀座全町，觀日技 (Nichi-geki) 演劇，雨夜巡視新宿遊樂地區，皆可紀也。導遊者有林榮梅、羅長闈、莊秩民、呂秋文諸先生，錄之以示不忘。至魏道明先生之迭宴，陳澤華、邱劍壽先生之送迎，尤所感幸。惟重勞諸友，心甚不安，加以台北有事待理，故於八月二十五日提前返國，前後在日本共為十日云。



# 出席國際亞洲歷史會議報告

張貴永

國際亞洲歷史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History) 自本年八月三十日至九月五日在香港大學舉行，為期一週，參加團體主要為國際亞洲歷史學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與東南亞歷史學家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ians)。其餘尚有遠東史前史學會 (The Far Eastern Pre-history Association)、國際海洋史學會 (La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d' Histoire Maritime)、印度歷史學會 (The Indian Historical Congress) 及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等學術團體臨時加入。我國出席該會學者有張貴永、嚴耕望、石璋如、余又蓀等十人。至於在香港星馬方面參加的中國學者則有羅香林、王賡武、王德昭等人。

大會自八月卅一日起宣讀論文，又因為九月一日係香港政府公定假日，乃於九月二日上午九時半開始補行大會開幕儀式，由香港大學副校長主席，主席團人員有亞洲歷史學會副會長菲律賓的阿貝拉 (Domingo Abella) 及中國的張貴永，新加坡大學歷史系主任及東南亞歷史學家會議主席特里岡寧 (K.G. Tregonning) 以及本屆大會籌備委員會主席，港大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哈利遜 (B. Harrison)。大會開幕儀式中，主席首先提到參加本次大會的兩個主要團體：亞洲歷史學會和東南亞歷史學家會議，並謂亞洲歷史學會會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杰博士，由於中研院正在舉行院士會議，不克分身前來參加。此外他並表示大會的宗旨在促進亞洲歷史學的研究和各國相互之間的諒解，以達成學術文化交流的目的。接着宣讀香港總督祝詞，全文如下：

「茲值國際亞洲歷史學會在港開會，本人謹對與會所有學者表示歡迎之忱，特別是對來自其他各地的學者。本人確信：此次會議將為亞洲歷史增一新頁，將能促進亞洲歷史的研究和亞洲人民的瞭解。」

本人以香港大學校長的身份，謹告與會諸位：本人深盼議程順利，進行討論能有豐碩的成果，並盼各位把晤愉快，使本次大會成為真正值得記憶的一次會議，謹此祝大會成功。」

開幕儀式舉行完畢以後，繼續討論論文，按大會議程規定，由部份與會者輪流擔任各次討論會主席，論文在會前印就，並經傳閱，由主席邀請各與會者對論文提出評論，最後由論文作者簡答各項問題。茲將主要議程及討論經過略述如下：

(一) 八月卅一日 (星期一)：上午十一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四十分，會議室。

討論題綱：歐洲國家勢力擴展早期時的東南亞

主席：雷哥 (A. da Silva Rego)，葡萄牙歷史研究中心  
論文與作者：

○十六世紀西班牙人對東南亞和太平洋的樂觀主義

作者：新加坡大學傑克興敦 (C. Jack-Hinton)

○印度對菲律賓影響的開始

作者：佛朗西斯哥 (Juan R. Francisco)，菲律賓大學

○東亞的胡椒貿易 作者：國立台灣大學曹永和

提出評論者：

○湯姆哈里遜 (Tom Harrison)，沙勞越博物館

○羅德里尼茲 (Rodriguez)，菲律賓大學

(二)八月卅一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至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化學館。

討論題綱：漢代社會與政治的變遷

主席：薈保孝 ( Yasutaka Fumoto ) · 日本防衛大學。

論文與作者：

① 西漢政治力量的社會基礎之變遷 ( 206 B.C.—8A.D. )

作者：許倬雲，中央研究院

② 西漢田賦之研究

作者：So Siu-hiny，香港中文大學

提出評論者：

(一) 克里斯披尼 ( Crespigny ) · 國立澳洲大學

(二) 八月卅一日下午二時卅分至四時卅分，會議室。

討論題綱：東南亞歷史資料的來源

主席：凱迪 ( John F. Cady ) 俄亥俄大學

論文與作者：

① 海牙所存有關於一六〇〇年至一八〇〇年東亞歷史一般檔案的來源

作者：梅林羅洛茲 ( M. A. P. Meilink-Roelofz ) · 荷蘭海牙

牙黎克斯檔案館館長

② 荷屬麻六甲的遺失檔案 ( 1641—1824 )

作者：佛何文 ( F. R. J. Verhoeven ) · 馬來西亞國家檔案室

③ 研究早期近代琉球的基本資料

作者：酒卷 ( Shinzo Sakamaki ) · 夏威夷大學

④ 有關東南亞歷史研究的最近發展

作者：賀爾 ( D. G. E. Hall ) · 倫敦大學

⑤ Chinese Sources of Brahmī and Kharosthī

作者：饒宗頤 · 香港大學

提出評論者：

① 范尼爾 ( R. von Niel ) · 羅素聖哲學院

② 格拉曼 ( K. Glammann ) · 哥本哈根大學

③ 賴特 ( L. R. Wright ) · 香港大學

(四) 八月卅一日下午五時至六時卅分：化學館。

討論題綱：沙勞越 Niah 洞穴的研究：十萬年前史前史的層次

研究

主席：湯姆哈里遜 ( Tom Harrison ) · 沙勞越博物館館長

哈里遜先生在本次討論會中提供其對本題綱自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四年長期研究的影片與報告，并展示有關 Niah 的資料

(五) 九月一日上午十時卅分至中午十二時，陸佑堂

討論題綱：美國在東南亞的政策

主席：理查布威爾 ( Richard Butwell ) · 伊利諾大學

論文與作者：

① 羅德島與爪哇間的貿易 ( 1799—1836 )

作者：Sharon Ahnat · 新加坡大學

② 美國與泰國的外交關係 ( 1830—1837 ) · 美國與東方國家締結的第一項條約

作者：約翰蒙 ( John W. Moon ) · 東德克薩斯州立學院

③ 美國在中南半島的政策

作者：伯納德佛爾 ( Bernard B. Fall ) · 霍華德大學

提出評論者：

① 范尼爾 · 羅素聖哲學院

② K. Sukhadany · 泰國 Chulalongkong 大學

(六) 九月一日上午十時卅分至中午十二時，會議室。

討論題綱：唐代至明代的中國對外關係

主席：張貴永，中央研究院

論文與作者：

① 以亞洲為背景看唐代中國

作者：烏布里奇賓汗 ( Woodridge Bingham ) · 柏克萊加州大學

② 明初對東南亞國家的外交政策 作者：Su Chung-Jen 香港

③ 鄭和航海圖的研究 作者：徐玉虎，香港中文大學

提出評論者：

① 湯姆哈里遜 · 沙勞越博物館

①K. Sukhabanij: Chulalongkong 大學

②Koh Byong-ik: 國立漢城大學

(七)九月二日上午九時至十時卅分，陸佑堂。

討論題綱：**中南半島的早期王國**

主席：烏布里奇賓汗：柏克萊加州大學

論文與作者：

①隋朝與唐初中南半島的政治演變

作者：荻原弘明 (Hiroki Ogihara)：Kagoshima 大學

②南詔與大理國歷史的研究

作者：李霖燦：國立中央故宮博物院

③南詔是否即為泰國的前身？

作者：許靈樵：新加坡 Ngee Ann 學院

④越南人民的華裔血統

作者：Nguyen-phuong：越南順化大學

提出評論者：

①王廣武：馬來亞大學

②K. Sukhabanij: Chulalongkong 大學

(八)九月二日上午九時至十時三十分，會議室。

討論題綱：**近代中國的改革與革命**

主席：巴涅特 (Doak Barnett)：哥倫比亞大學

論文與作者：

①中國的共和運動 (一八九四—一九二一)

作者：鄭憲：愛奧華州立學院

②辛亥革命中國知識份子所扮演的角色

作者：王德昭：南洋大學

③中國革命家在香港 (一八九五—一九一一)

作者：Mary Chan Man-yue：香港大學

④吳稚暉的大同思想 作者：郭穎頤：夏威夷大學

⑤孫中山先生祖先的考證 (中文) 作者：羅香林：香港大學

提出評論者：

①郭穎頤：夏威夷大學

①王德昭：南洋大學

(九)九月二日上午九時至十時卅分，化學館。

討論題綱：**中亞歷史的研究**

主席：H.K. Sherwani：加爾各答大學

論文與作者：

①Great Britain and Yakub Beg-an Imperial Excursion into Central Asia

作者：胡騰北 (R.A. Huttenback)：加州理工學院

②談拉達克 (Ladakh) 邊界問題

作者：阿拉斯提蘭姆 (Alastair Lamb)：國立澳洲大學

③Kazi U-Gyen: "A Paid Tibetan Spy"?

作者：Parshatam Mekra, University of Punjab

提出評論者：

R. Rahul：印度國際問題研究所

(十)九月二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化學館。

討論題綱：**歐洲經濟與商業擴展期中的東南亞**

主席：米爾頓薩克斯 (Milton Sacks)：布蘭德斯 (Brandeis) 大學

論文與作者：

①英國、西班牙與葡萄牙在英屬港口與馬尼拉之間的祕密通商 (一七八五—一九九〇) 作者：W.E. Cheong：香港大學

②英屬東印度公司與馬尼拉的早期貿易關係

作者：Seratin D. Quason 菲律賓賓大學

③農耕種制度輸入爪哇 Pasuruan 的原因

作者：范尼爾：羅素聖哲學院

④模里斯島與遠東的貿易關係 (一七七三—一八一〇)

作者：托桑，法屬模里斯島檔案室

提出評論者：湯姆哈里遜：沙勞越博物館

史邁爾 (J.R.W. Smail)：威斯康辛大學

(十一)九月二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陸佑堂

討論題綱：**民國以後的中國政治**



主席：亞蘭柯爾 (Allan B. Cole) · Tufts 大學

論文與作者：

○民國以後的中國政治與地方主義 (一九一一—一九三七)

作者：霍華德包爾曼 (Howard L. Boorman) · 哥倫比亞大學

○中國的「軍閥時期」(一九一六—一九二七)

作者：Odong Wou · 香港大學

○盛世才與其六大政策

作者：Gilbert Chan Fook-lam · 香港

提出評論者：郭穎頤 · 夏威夷大學

(十二) 九月二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討論題綱：考古學討論會：進行中的考古報告

主席：湯姆哈里遜 · 沙勞越博物館

論文與作者：

○南新赫布里底羣島 (Southern New Heebrides) 的考古

作者：理查謝特勒 (Richard Shutler) 火奴魯魯 (Bishop Museum)

○南新赫布里底羣島的考古調查與沉澱物狀況

作者：瑪麗謝特勒 (Mary G. Shutler) · 火奴魯魯 (Bishop Museum)

○東南亞紀念碑巨石的新貌

作者：盧伏斯 (H.H.E. Looft) · 國立澳洲大學

○研究泰國史前史的最近成果

作者：(Wilhelm Solheim) · 夏威夷大學

(十三) 九月三日上午九時至十時卅分，陸佑堂

討論題綱：歐洲國家領土擴張時期的東南亞

主席：范尼爾 · 羅素聖哲學院

論文與作者：

○十九世紀東南亞英國利益的管理

作者：達林 (P.N. Tarling) · 昆士蘭大學

○帝國與王國：英國與緬甸王國間不可抑制的衝突

作者：佛蘭克脫拉吉 (Frank N. Trager) 紐約大學

○詹姆士布魯克 (Raja James Brook) 統治下的沙勞越與英國的承認 作者：賴特 J. R. Wright · 香港大學

提出評論者：

○湯姆哈里遜 · 沙勞越博物館

○伊瑪沙達克 (Emma Sadka) · 國立澳洲大學

(十四) 九月三日上午九時至十時卅分，化學館

討論題綱：日本近代史

主席：格蘭特固特曼 (Grant K. Goodman) · 堪薩斯大學

論文與作者：

○Okuma Shiganoibu 與一八九八年的菲律賓問題

作者：薩尼爾 (Josefa M. Sanie) · 菲律賓賓大學

○伊藤博文、山本與高平：日本防衛軍的演變

作者：秋田 (George Akita) · 夏威夷大學

○戰前的日本民主政治

作者：多騰 (G.O. Totten) · 羅德島大學

提出評論者

○布涅特 (N.P. Benett) · 香港大學

○E. Cheong · 香港大學

(十五) 九月三日上午九時至十時卅分，會議室。

討論題綱：印度的民族主義

主席：普拉沙德 (Bhishwar Prasad) · 德里大學

論文與作者：

○西方對印度的回教民族主義發展的影響 (一八五七—一九〇〇)

作者：梅立克 (Hafeez Malik) · Visva-Bharati 大學

○從歷史編纂看印度的民族主義

作者：包斯 (A. C. Bose) · Visva-Bharati 大學

○社會組織對南印度政治權力的影響 (一八〇〇—一八六〇)

作者：勞勃佛里根伯 (Robert E. Frykenberg) · 威斯康

辛大學

提出評論者：勞勃佛里根伯：威斯康辛大學

(十六)九月三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陸佑堂

討論題綱：菲律賓近代史中的政治與社會演變情形

主席：阿貝拉 (Domingo Abella)

論文與作者：  
①「移民潮」——一九〇〇年至一九四〇年日本移民菲律賓的情形與問題  
作者：格蘭特固特曼 (Grant K. Goodman)：堪薩斯大學

②奎松——衆所敬仰的保守主義者  
佛林德 (Theodore Friend)：紐約州立大學

③菲律賓民族主義的地勢學 (一八九〇—一九四六)  
作者：Uaha Mahajani：國立澳洲大學

④馬尼拉地區的研究  
作者：海倫脫邦吉 (Helen Tabangal)

提出評論者：  
①Usaha Mahajani：國立澳洲大學

②C. O. Resurreccion：遠東大學

(十七)九月三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化學館。  
討論題綱：亞洲歷史的解釋

主席：霍華德李維 (Howard S. Levy)：東京F. S. I. 語言學校  
論文與作者：

①超過意識形態的文化綜合研究  
作者：霍華德迪茲布里 (Howard F. Didsbury)：紐華克州立學院

②中日兩國推行現代化結果之所以不同的原因  
作者：亞蘭柯爾：Tafts 大學

③中共歷史見解的分析  
作者：Lu Yau-tung：香港中文大學

④歷史學與心理學關係中的歷史方法論

出席國際亞洲歷史會議報告

作者：Euchiro Tomoyose：琉球大學

⑤泰國歷史的分期  
作者：Rong Syamanda：Chulalongkorn 大學

提出評論者：

①梅立克 (Hafeez Malik)：Vilanova 大學  
②Koh Byong-ik：國立漢城大學

(十八)九月三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會議室  
討論題綱：唐宋歷史專題研究 (中文會議)  
主席：牟潤蓀：香港中文大學

論文與作者：  
①宋朝的中日關係 作者：余又蓀：國立台灣大學

②唐代的行政：組織與功能 作者：嚴耕望：中央研究院

③唐代景教的流傳 作者：羅香林：香港大學

④南朝與隋唐三代的中菲關係 (四二〇—九〇七)  
作者：吳景宏：香港

提出評論者：  
①羅香林：香港大學  
②Albert Chan S. J.：香港Wah Yan 書院

(十九)九月三日下午二時卅分至四時三十分，陸佑堂。  
討論題綱：亞洲歷史的教授  
主席：布里安哈里遜 (Brian Harrison)：香港大學

論文與作者：  
①綜觀亞洲歷史的一般課程  
作者：華爾特費 (Walter R. Fee)：密西根州立大學

②西方史學家撰寫遠東歷史所面臨的困難  
作者：Donald H. Bishop：華盛頓州立大學

提出評論者：  
①約翰凱迪 (John F. Cody)：俄亥俄大學

②范尼爾：羅素聖哲學院  
③梅立克：Vilanova 大學

(二十)九月四日上午九時至十時三十分，會議室。

討論題綱：十九世紀末葉遠東的國際關係

主席：華爾特費 (Walker R. Fee)：密西根州立大學

論文與作者：

①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一八九四年的英日商約

作者：尼希 (I. Hi. Nish)：倫敦政治與經濟學院

②自治殖民地與英日關係中的地位 (一九〇一—一九〇五)

作者：貝涅特 (N. R. Bennett)：香港大學

③英國對帝俄遠東政策的態度 (一八九五—一九〇二)

作者：L. K. Young：香港大學

④清末中國勞工在南非金礦區的情況

作者：宋晞：中國文化學院

⑤沖繩的英國傳教士 作者：Yoshikiko Teruga：琉球大學

提出評論者：

①喬治明田：夏威夷大學

②Shen-yu Dai：科羅拉多州立大學

(廿一)九月四日上午九時至十時三十分，化學館。

討論題綱：考古學的研究近況

主席：Wilhelm Solheim：夏威夷大學

論文與作者：

①韓國稻米種植的開始

作者：Won-Yong Kim：國立漢城大學

②人類與軟體動物

作者：托馬斯卡洛爾 (Thomas D. Carroll)：台中五國文字字典編纂計劃主持人 (卡洛爾神父在開會前夕不幸逝世)

③殷商帝國的東部交通路線 作者：石璋如：中央研究院

(廿二)九月四日上午九時至十時三十分，陸佑堂。

討論題綱：東南亞歷史的傳統與改變

主席：特里岡寧 (K. G. Tregoning)：新加坡大學

論文與作者：

①海峽殖民地 (前英屬新加坡、檳榔嶼、馬六甲等地舊稱) 的

通貨改革 (一八六七—一九〇六)

作者：Chiang Hai Ding：新加坡大學

①輪船初臨緬甸內河與伊洛瓦底江輪船公司的組成

作者：Jhanorg Blackmore：香港

②Mongkut王和Mindon王的比較研究

作者：約翰凱迪：俄亥俄大學

③緬甸與傳教士：信仰轉變的因素

作者：海倫脫拉吉 (Helen G. Trager)：紐約

④引起印尼革命的社會典型人物：爪哇的海盜，日本軍人和美

國西部的牛仔

作者：史邁爾 (J. R. W. Smail)：威斯康辛大學

提出評論者：

①M. Blackmore：香港大學

②W. E. Cheong：香港大學

(廿三)九月四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陸佑堂

討論題綱：東南亞社會問題的研究

主席：Rong Syamanba. Chulalongkong 大學

論文與作者：

①十九世紀末葉新加坡的馬回世界

作者：威廉魯夫 (William R. Roff)：莫那許 (Monash) 大學

②英國統治馬來亞華人的初期成功

作者：傑克生 (R. N. Jackson)：香港大學

③沙勞越華人方言的研究 作者：李亦園：中央研究院

提出評論者：

①史邁爾：威斯康辛大學

②特里岡寧：新加坡大學

(廿四)九月四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化學館

討論題綱：近代中國政治與社會制度的演變

主席：王賡武：馬來亞大學

論文與作者：

①清代帝位世襲的研究 作者：陳捷先：國立台灣大學

○前清政府官員所受的實際訓練(一六四四—一七九五)

作者：Adam Lui：香港大學

○張謇在中國實業發展上的地位

作者：Mabel S. Y. Lee：雪梨大學

提出評論者：

○M. Blackmore：香港大學

○Adam Lui：香港大學

(廿五)九月四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會議室

討論題綱：澳門的歷史

主席：H. de la Costa S. J., Ateneo de Manila

論文與作者：

○澳門的黃金時代

作者：Eusebio Arnauz: Redemptorist Fathers, Macao

○舊澳門的解釋者與翻譯者 作者：J. M. Eraga：香港

○澳門耶穌會書院的淵源

作者：B. A. Pires S. J. Macao

○孔有德叛變(一六三一)與火器之使用

作者：Albert Chan S. J. Wah Yan College, Kowloon

提出評論：J. Braga：香港

(廿六)九月五日上午九時至十時卅分，化學館

討論題綱：中國文化史的研究

主席：郭穎頤：夏威夷大學

論文與作者：

○北宋時期儒學的發展 作者：蘆保孝：日本防衛大學

○中國文化發展的地域因素 作者：張貴永：中央研究院

○纏足

作者：霍華德李維(Howard S. Levy)：東京 F.S.I. 語

言學校

○明代瓷器的輸出

作者：Ling-Yeng Chiu：雪梨大學

○有關「史記考」的修訂問題

出席國際亞洲歷史會議報告

作者：Lo Ping-min：香港中文大學

提出評論者：

○Marjore Topleg：香港

○王德昭：南洋大學

(廿七)九月五日上午九時至十時三十分，會議室

討論題綱：東南亞歷史傳統時期的研究

主席：格拉曼(Kristof Glanmann)：哥本哈根大學

論文與作者：

○十八世紀的越南社會

作者：Nguyen Tran Huan：巴黎大學

○老蘇祿國國王之王位，王權或領土的政治與歷史的研究

作者：Cesar A. Majul：菲律賓賓大學

○姆漢默德亞里木十一世(Muhammed Alimuddin I)：蘇

祿國國王(一七三五—一七七三)

作者：H. de la Costa, Ateneo de Manila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Family Register of the

Trans, a Ming Refugee Family in Minh Huong-Xa,

Thua-Thien (Central Vietnam)

作者：陳荆和：香港中文大學

提出評論者：賴特(L.R. Wright)：香港大學

所有論文討論完畢以後，旋即於九月五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開

始召開事務會議，會中決議：

一、亞洲歷史學會與東南亞歷史學家會議兩個組織合併為國際

亞洲歷史學家會議，公推馬來亞大學歷史系主任王廣武為會長，

哈里遜(Harrison)及岩生成一為副會長。

二、國際亞洲歷史學家會議三年後在吉隆坡召開下次會議。

三、成立資料中心——詳細情形交小組會議研商。

四、印度代表強調亞洲歷史應包括中亞、近東與阿拉伯國家。

五、由香港大學出版本屆會議論文。

事務會議結束後，本屆會議亦就宣告閉幕。七日至八日全體代

表會應澳門政府邀請，往澳門遊歷。

日

本

之

修

憲

問

題

張棟材

## 一 現行憲法之特徵

日本朝野現正對其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展開為修憲和護憲的論爭甚至行動上的政治鬥爭。爲了要明瞭其中真相及其今後演變動向，首先要對日本的新舊憲法內容有一個概括的比較評價。

日本之現行憲法係於一九四六年（昭和廿一年）十一月三日公佈並於公佈後滿六個月之翌年五月三日開始施行，且定每年是日爲憲法紀念日。近年來有關修憲與護憲問題的論爭，也以在這個紀念日前後表現得最爲激烈。按日本原有的舊憲法係於一八八九年（明治廿二年）二月十一日公佈而於翌年十一月廿九日召集第一屆帝國議會施行，其與新憲法之時間距離已有五十餘年。從制定經過以至所遵據的基本主義原則和精神來看，新舊憲法之間都有極大的差異，而這差異也正是形成新憲法特徵的要素；產生今日修憲要求的伏因。

新憲法的特徵是在和舊憲法的對比之下，鮮明地呈現於下列三點：

一、天皇制度在實質上的根本改變：日皇裕仁於公佈新憲法之當年元旦，曾先行發表詔書來否定過去有關對天皇的神話傳說式之神格，而以人的地位表示其願與日本國民更始，致力於互信互愛。新憲法雖仍保留天皇制度，但在第一條明定天皇之地位，係「爲日本國之象徵，及日本國民統合之象徵，其地位，基於主權所在之日本國民之總意。」在第四條更規定「天皇僅得爲憲法所規定有關國事之行爲，無干與國政之權能。」將天皇行使所謂「有關國事之行爲」，限制於在第七條所規定之僅有形式的或禮儀的權能範圍，即天皇僅能將國會或內閣所已決定的國事表現於外部或予以認證，他

並沒有發言權與否決權。這和舊憲法視天皇爲神聖不可侵犯而由天皇總攬國家統治大權的天皇至上制度，已在實質上有了根本改變。

二、追求國際和平目標的大膽嘗試：新憲法中特設「戰爭之放棄」一章，於第九條規定：「日本國民誠意希望以正義與秩序爲基礎之國際和平，永久放棄以發動國權之戰爭，以武力威嚇或行使武力，爲解決國際紛爭之手段。爲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或其他戰力，不承認國家交戰權」。類似此種對國際和平構想所作嚴格具體之規定，這在世界憲法史上，亦尙屬史無前例的創舉。日本舊憲法乃是明治維新時期專以富國強兵爲急務之產物，故極富於軍國主義性格，例如訂有若干尊重軍人特殊地位及有關軍備與戰爭之規定，其後都成爲軍閥崛起干政並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護符。新憲法爲但求免於重蹈覆轍，特寄望於「放棄戰爭」「不保持戰力」，以追求國際和平目標，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大膽的嘗試。

三、尊重基本人權實踐國民主權的和平革命功效：新憲法首在序言中宣告「主權存於國民」，繼即一再表明尊重基本人權，於第十一條規定：「國民所享有之一切基本人權不受妨礙，本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應爲現在及將來國民永久不可侵犯之權利。」並於第十二、十三、十四等條中強調尊重任何國民之人格，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之權利；任何國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因人種、信仰、性別、社會身份或門第而有差別；不承認華族或其他貴族制度，而意猶未足，復於第十章「最後法規」內之第九十七條再特加註釋其所保障之基本人權爲「對於現在及將來之國民，作爲不可侵犯之永久權利而被信託者。」證諸舊憲法中規定天皇有極大之立法權，軍部每利用第八、九、十、十四、卅一等條規定即可使其任意限制人民權利發生不尊重人權情形，而新憲法鑒於此點，則從尊重基本人權上出發，用以實踐國民主權主義，對日本國內政治社會之蛻變

，實已發揮了「和平革命」的功效。

上述三點，係指日本新憲法最顯著的特徵而言。要言之，日本舊憲法和新憲法相較之最大不同處是：前者是含有極濃厚的君主集權成分的欽定憲法；後者則為確定主權在民而以國民主權主義為基礎的民定憲法。

## 二 修憲要求之由來

新憲法會給日本國民帶來了一個新的感受與憧憬。但在經過韓戰、舊金山對日和約、日本由被佔領恢復為獨立國家之後，自一九五二年起，要求修憲的呼聲却在日本朝野間逐漸增高。其造成此一現象的主要原因為下列兩項：

(一)由於有關報道美國於佔領日本期間之若干措施內幕的書刊文件被公開發表，如麥克·蓋因所著之「日本日記」；哈里·渥茲所著之「東京旋風」；美方公佈之「美國在日敗降初期之對日政策」文件等均涉及日本新憲法制定經過，暴露出美國強制日本接受該憲法的事實，因之乃立即被稱為「麥克阿瑟憲法」「強制憲法」，使日本國民對其大起反感，認為必須重新制定真正的出自日本國民公意的自主憲法。

(二)韓戰刺激起日本對來自共產集團之侵略的警覺，再軍備論乘機抬頭，於是對新憲法中第二章所定「戰爭之放棄」的理想，便開始由疑問而動搖，咸認其陳義過高，等於完全不能適應內外實際情勢的一種和平幻想，主張國家為求自衛自須保持戰力，為使其合法化，即不能不自修憲着手。否則，軍隊戰力將無從建立精神支柱。

二者之中，尤以第一項幾乎是影響着日本的大多數人心。故主張修憲的有力人士，也在儘量意圖利用此一大眾感情，推動修憲的實現運動。關於此項所指稱者是否屬於事實，除見前述書刊文件外，尚可舉出若干政治家的公開言論來作參證：

(一)前美副總統尼克森於一九五三年十一月間訪問日本時，曾向日人演說坦白承認「美使日本制定放棄戰爭及不保持戰力之憲法

日本之修憲問題

，為當時佔領政策之錯誤」。尼氏並表示「希望日人能予改正」。

(二)日故首相鳩山一郎於一九五四年組閣時力主修憲，曾指稱：「新憲法為日本被佔領中之物，係在外國強烈暗示而於短期間倉促制定者。此在日本已獲獨立之今日，理應將其修改為符合多數日本國民自由意志與國家獨立之憲法。」

(三)日憲法調查會會長高柳賢三曾於一九六三年六月及本年二月先後對當年向日本政府提示之「麥克阿瑟草案」兩度發表其觀點稱：「該草案並非強制，而係『勸告』，亦反映有日本方面對天皇制與放棄戰爭之意見」。提出所謂「日美合作之憲法」新論。

根據上述諸點，大致可以確定日本新憲法之制定是受了美國的幕後指導而成。它雖較舊憲法及日本朝野於當時所提出之若干種新憲法案都最富民主主義成分；且亦曾受日本國民之普遍支持，但在恢復獨立後日本人的民族意識裏，則總認為這是傷害了它的民族自尊心的恥辱而極思有以消弭，所以要求修憲的動機實即由此而來。至於第二項在作為要求修憲的動機來說，只是第一項的從屬，因其偏於法理問題，尚有解釋的迴旋餘地可尋，而且事實上日本政府已在解釋上採取了不徒受第九條羈絆的行動，如初成立警察預備隊，繼又擴充為自衛隊以掩飾「軍隊」名稱，且於內閣中設有「國防會議」及「防衛廳」等機構，已無異於將第二章「戰爭之放棄」規定作了部分的修正。

要求修憲的運動既已在日本朝野各方面擴大，何以至今尚難以見於具體行動？這固然是受制於內外客觀情勢，而新憲法為極剛性之憲法，對修改的嚴格限制，也是使它在行動上受阻的一個最大的障礙。依照其第九章「修改」一章中第九十六條規定：它的修改要經過各議院全體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贊成後由國會發議；并應向國民提案經其承認，此項承認應於國民特別投票時，或舉行國會規定之選舉投票時得到過半數之贊成；然後再由天皇以國民之名義公佈，這三個繁雜的程序，使日本當前的修憲陣營視為荆棘叢生的畏途，對護憲陣營却成了易於防守的關隘。

## 三 憲法調查會之長期工作

戰後在日本首相中對新憲法最毫無避諱地主張從速修改的，當推鳩山一郎及岸信介二人。一九五四年鳩山內閣成立時，鳩山即公開宣稱將以推動修憲為施政方針。不過，鳩山所計議在國會設置「超黨派的憲法調查機關」的計劃因遭受在野黨社會黨的反對，却連退而求其在內閣設置「憲法調查會」而向眾院提出的「憲法調查會法案」，亦因被擱置而未能實現。到了一九五五年，自由民主黨在保守勢力第二次大團結下組成，並在其政綱中標明推行自主修改現行憲法，乃使修憲論之聲勢為之大振。故翌年終於在國會通過了「憲法調查會法案」，使「憲法調查會」這一個負有指導修憲任務的機關，便在一九五七年八月於岸內閣時期正式成立。

根據該法案第二條規定，憲調會的職掌是：「檢討日本國憲法，並調查審議諸有關問題，將結果向內閣及通過內閣轉國會提出報告」。人事組織原定為五十人，由國會議員三十人及富有學識經驗者二十人組成，惟因社會黨拒絕參加，遂有十名空額，其後又有部分人事上的變動，最後乃只有屬於自民黨的委員十九人，富學識經驗人士的委員十九人共計三十八名，外加專門委員六人。該會在歷時七年中曾召開大會一百三十一次，分組委員、部會三百七十九次，公開辯論會五十六次，邀請到會作證者四百一十八人，共用去巨額經費達日幣二億七千萬元。其工作成果，則是在今年七月三日向內閣提出的長達五千六百頁的最終報告書四編及附件十二冊，容納了豐富的資料與各方面的種種意見。

該會雖耗去長期時日與龐大經費，但就其工作表現論，亦確能盡到認真、細緻、週密的調查審議職責。例如對有關促使修憲論的制憲經過是否受美國強制與新憲法是否適合國情等兩問題，即曾以費時四年之慎重態度向國內及海外遠及歐、美諸國蒐集資料並訪問有關參證人士，結果取得美國務、陸、海三部協調委員會之對日政策文件（SWNCC—二二八）大平紀事（故幣原首相對大平駒槌談話紀錄）拉萊爾備忘錄（舊盟總民政局法規課長所提出者）……等，這都是極珍貴的文獻。

該會之最終報告書，由起草到提出，計費時一年。在憲調會內部曾因贊成修憲的人數多與反對修憲的人數少而發生是否採取多數

表決方式的問題。因之，在此一報告書中對應否修憲一事則避免作成結論的形式。其採取方式，正如該會會長高柳賢三將報告書提交池田首相時所說：「遇有兩個意見對立的場合，不以多數表決，而將其並列。」自民黨籍委員中曾根康弘更將此一無結論的報告書喻為「菜單式」，謂各種意見和事實都並列着等待國民選擇下箸。

高柳賢三會長報告書提出之日，亦曾撰專文發表，強調此一報告書之最大特色即為對應否修憲問題未作結論。但這種說法仍屬飾詞作用，其目的在求沖淡世人把憲調會視為推動修憲機關的觀感。而事實上，報告書的內容也還是對修憲問題等於作出了最後結論，只是暗示性多於明示性之別而已。例如第四編第四章為專論「應否修改日本國憲法」，這是全篇報告書的最重要部份，該章首先舉出「憲調會內主張修憲者佔多數，反對修憲者佔少數」。且稱：「現行憲法之不完備處與缺陷，已至無法以解釋、運用求取適應措置之階段。」「今日已為必須邁入修改方向之時期，應從速確立方針，着手於為求實現之必要活動。」在這種情況下，相反的意见雖然被列於後，但只能助長烘托全面客觀公正的色彩效果，更增加了前者暗示性結論的傳播力。

#### 四 修憲與護憲勢力之對立

日本國內由應否修憲問題而形成的修憲與護憲兩個陣營勢力，都是壁壘分明地分佈於政黨、高級知識份子及民間社團之內。代表修憲的為現執政黨自民黨、大部分學者與社團；其以護憲為對抗前者之號召的則為社會黨、民社黨、共產黨以及存在於各階層的同路人。但這只是大致的區分，實際上各陣營內部亦尚有若干紛雜的歧見。

照日本輿論界所分析的日本各界對現行憲法的論調，可以分成下述七個派別，從這裏面亦能看出上述兩個陣營勢力的羣衆基礎：

- (一) 超保守的修改論：傾向於重溫明治憲法之舊夢，例如主張恢復天皇主權等，為自民黨及學術界極少數之意見。
- (二) 保守的修改論：對現行憲法中有關主權在民、放棄戰爭、



基本人權、議院內閣制等規定，認為應加以限制，如主張修改第九條以確定自衛體制等。憲調會委員愛知揆一（自民黨議員）大西邦敏（早大教授）等十七人之意見書「修憲之方向」一文，為集此種意見之代表作。自民黨內過半數及學術界多數學者均持此種意見。

(二) 特殊修改論：主要為廢止現行之議院內閣制；徹底實施三權分立；以國民投票直接選舉首相與副首相等主張，為自民黨及學術界一部分之意見。

(四) 不必修改論：主張以政治的良知解釋現行憲法，再加善為運用即可適應自如，故並無加以修改之必要。如謂自衛隊為合憲等，高柳憲調會會長曾為此提出意見書，為此種意見之代表。民社黨、「護憲新國民會議」幾全體均屬此種意見，一部分自民黨、社會黨、學術界人士亦有此一傾向。

(五) 完全實施論：以主張完全實施現行憲法之規定為持論之重點，如謂自衛隊為違憲，應照「放棄戰爭」之規定，堅守不保持戰之力之信念。社會黨、「護憲國民聯盟」之活動方針即屬此，學術界亦多有持此意見者。

(六) 革新的修改論：認為如欲充分發揚現行憲法之精神，即應作部分的修改。鶴飼信成、辻清明等學者之「公法研究會」，田中二郎、金子一等東大教授之「憲法研究會」均先後提出「改正意見書」，在社會黨及學術界護憲勢力中有潛在的支持者。

(七) 革命的全面修改論：此類論調係指現行憲法為資產階級之所有物，必須另行制定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或共產主義社會之憲法。舊左派社會黨之綱領及「社會主義憲法論」；共產黨之「日本人共和國憲法草案」，可作此類之代表，但在社會黨及學術界中，亦隱伏同於此類之意見。

自憲調會發表「最終報告書」後，修憲與護憲的兩個對立勢力自然很可能造成一次論戰的高潮以至敵對的鬥爭行動。其以自民黨為主幹的修憲陣營在這方面因有事前之心理準備，則出以沉着方式向爭取國民大眾的好感努力，將憲調會報告書廣為印刷，使其作為對國民大眾的憲法教育宣傳課本，這是自民黨想從基層去抵制反修憲者以至曲言論煽動羣衆的一個新作法。

## 日本之修憲問題

但在另一方面，護憲陣營內的主力社會黨、總評則積極利用其御用社團「護憲國民聯盟」以動員羣衆示威方式已藉口反修憲掀起同於上次的反安保條約運動的羣衆運動規模，同時，在日本全國四十六都道府縣也建立起該社團的地方組織網。民社黨系社團「護憲新國民會議」，以及共產黨之反修憲活動雖較社會黨及「護憲國民聯盟」的陣容為小，且有相互爭奪領導權的矛盾，可是在以此為反政府口實的共同基礎上，仍是可以統一行動的。

## 五 今後展望

從日本朝野各方面所舉辦的有關憲法問題之以知識份子為主的民意調查看，有百分之四十四以上對應否修憲毫不關心；六千萬名的有選舉權者亦竟有超過半數對現行憲法內容亦茫然無知。現在修憲陣營一再宣稱修憲與否要取決於民意之歸趨，其致力途徑已很顯明地要儘一切可能爭取這些國民對象，它所採取的政策是溫和的長期宣傳誘導。但站在反修憲立場的護憲陣營方面，則因並非真正地有所愛於現行憲法，而只是以此為進行反美反政府運動的藉口，所以它雖然也和修憲陣營同樣地急謀爭取國民大眾，却深恐國民取得像憲調會報告書那樣的有力的判斷資料，反被揭露出它的真面目，因之它在今後的致力途徑將儘一切可能使護憲之行動鬥爭化，以擴大假冒民意之組織力量襲脅羣衆。

兩個陣營在憲法問題上爭取民意的考驗，將在明年的參院選舉得到一次答案。在此之前，日本的輿論界勢必通過大眾傳播的各種機構與工具以修憲與否問題作為討論中心，關乎此點，修憲陣營的溫和的長期宣傳誘導政策，將能造成有利條件。

我們可以初步預測，日本在未遭遇內外的重大刺激前，它不會採取斷然修憲的步驟。但亦有跡象顯示日本的有識之士已對此種近乎苟安的態度抱有隱憂，開始提出「一九七〇年之危機」的警告。一九七〇年是美日安保條約滿期，日本自衛體制能否面對現實的一個決定年。作為爭論焦點之新憲法第九條，將在能否修改為適應日本可以免於赤禍的要求與否，在左右着日本的未來國族命運。

# 國際貨幣制度與 貝恩斯坦改進方案

林 霖

一國經濟繁榮與蕭條，直接間接地受國際貿易盛衰的影響，隨國際貿易的開展而產生的問題甚多，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國際支付問題，所謂國際支付問題就如何結清進出口貨的價款和勞務供享的報酬問題。國際支付與國內支付一樣，皆有賴於貨幣的使用，但國外支付不能如國內支付一樣使用本國貨幣，所能使用的是以國際貨幣為限，因此國際貨幣制度的完善與否對於國際經濟實有密切的關係。

現行國際貨幣制度係指自國際貨幣基金協定生效以來，所實行的制度，這是一個什麼性質的貨幣制度呢？第一、會員國貨幣均以黃金及美元為訂立平價的標準，第二、各國貨幣均以黃金及外匯為準備。第三、國際貨幣基金為各國貨幣合作的統一機構。

嚴格的說，在現行制度之下，國際間並無一個法定的國際貨幣單位。但透過「平價」建立的制度，會員國貨幣，相互間都有聯繫。簡單的說，凡是會員國要享受基金協約的權利，其中一個條件，就是要規定該國貨幣單位固定價值。這個固定價值稱為「平價」(Par Value)，平價的規定是以黃金及美元為標準。比方說，英鎊一單位值純金二·四八八二八公分，同時值美元二·八〇元。由於美元本身的平價是以黃金來訂定，所以嚴格的說，所有會員國(包括美國在內)的貨幣單位價值，最後都是以黃金為共同標準的。黃金與美元不但成為各國貨幣單位價值的共同標準，且成為各

國貨幣制度的準備。各國有自己的國幣或地方幣。在各國內，一切價款和報酬的支付以及債務的償還，必須以本國國幣為之；但外貨價款和外人勞務報酬以及外債本息，則必須以黃金或外幣支付或償還之。此所謂「外幣」，係指外國貨主或債權人國家的國幣，或他們所願意接受的第三國的國幣。普通統稱這些外幣為「外匯」。由於黃金與美元均為國際貨幣基金所規定的計算各國國幣平價的「法定」標準，且黃金同時是各國繳納國際貨幣基金攤額四分之一的共同「貨幣」，又是購回本國通貨(即償還對基金負債)的主要「貨幣」。因此，黃金成為國際貨幣的準備。

美元原不過是國際間「外匯」的一種，它在現制之下所以能與黃金「平分秋色」享有特別地位，是因為：第一、它自一九三四年以來，一直能照新訂「平價」與黃金互相兌換，因此，其價值與金價一樣穩定，不但如此，且因美國在國際經濟及貿易，以及在國際貨幣基金所占的特別重要地位，美元不但已是各國國幣計算平價的標準，且成為國際交換的媒介、價值的儲蓄和未來支付的標準。換言之，美元成為各國所欲爭取的「貨幣」。因此也就成為國際貨幣準備的一種(目前各國所持有的「外匯準備中」，除美元外，尚有英鎊，比較重要)。

凡是國際貨幣基金的會員國，必須由其中中央銀行，或財政部保有相當數量的國際貨幣準備。美國貨幣的準備，在法律上限制於黃金，其他各國貨幣的準備，除黃金外兼用美元。這個國際貨幣準備的功用，主要有二：一、用以維持各國國幣的平價。依照國際貨幣基

金協約的規定，各國貨幣在正常情況之下，其匯率的漲跌各不得超過平價的百分之一。要維持固定平價，其在美元，係透過黃金的買賣；至其他各國貨幣，則係透過美匯的買賣。二、用以「支付」當期國際貿易收入不敷支出的差額。其在美國，在正常情況之下，以創造更多美元外匯為手段，但最後則以輸出黃金為結清手段；其在其他各國，主要的是以美元外匯為支付手段。反過來說，美國收支如有盈餘，則輸入黃金，其他各國，如有盈餘，多數採取積聚更多美元外匯的辦法。

現供國際貨幣準備之用的黃金和美元兩者的供給量，都是有限的。黃金是受新出土黃金產量的限制。自由世界各國每年出產黃金是主要的來源。另一來源為蘇俄及其附庸國家所願出售的黃金。

美元外匯的來源是受美國國際收支結餘的影響。當美國國際收支發生短絀時，美國以外各國所能持有的美元外匯便增加，倘有盈餘時，則減少。這是因為在美國國內言，美元的增加是美國銀行負債的增加，美元的減少是美國銀行負債的減少；對國外言，外人持有美元的增加，便是美國整個國家（以銀行為代表）對外負債的增加；反之，則減少，對外負債增加或減少可從每年國際收支情況觀察出來。國際收支如有結餘，負債增加；如有盈餘，負債減少。假如美國國際收支剛好相等，那麼它的對外負債已不增也不減。在這種情形下，國際貨幣準備總量可能增加，也可能減少。這是因為各國貨幣制度所規定的黃金準備率或高或低，各不相同，但同時各國互相間有轉移支付美元或黃金的可能。如果黃金準備率較低的國家，有了國際收支結餘，而以美元轉移支付給黃金準備率較高的國家，那麼後者可能將多餘的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這樣，美國黃金準備減少，自由世界其他各國準備總量不變。反過來說，如果黃金準備率高的國家，發生了國際收支結餘，而以黃金支付給黃金準備率低的國家，那麼後者可能將黃金出售給美國以增加美匯準備。這樣，美國黃金準備增加，自由世界其他各國的準備並無增減。可知在後一個假設情況之下，全世界貨幣準備增加，但在前一假設情況之下，全世界貨幣準備減少。此外還有一種場合，即假如美國貨幣準備也兼用外幣而不限於黃金的話，美國國際收支雖然有盈餘，美國不會

減少其對外負債，故其他各國所持美元準備可以不減少。許多學者認為：現行國際貨幣制度本身即含有不穩的可能性。因為這個制度特質之一，就是那充作準備的美元，係信用貨幣。這種信用貨幣要靠黃金兌換來維持它的價值。可是與時俱增的國際貨幣準備的需要，不能單靠有限的黃金增量來滿足。倘國際貨幣準備組成比率，即信用貨幣部份對黃金部份的比率，不能提高的話，一旦持有準備的公私機構對於國際貨幣失去信心，則現行國際貨幣制度便要發生動搖不穩的現象。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世界貨幣準備的來源，雖然係以貨幣用黃金存量的增加，及美國國際收支結餘的膨脹為主，但美元的比重，漸形提高。從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二年十年間，全世界貨幣準備用黃金準備約增加了五十五億美元。只等於一九五二年底準備總量的百分之十五。在同一期間內，世界其他各國（即美國除外）黃金和外匯準備合計總量約增加值一百九十億元，約等於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七十五。但上述各國準備總量的增加其中三分之二的來源，係由美國黃金出口所構成。可是美國黃金外流是不能持久的現象。

考自一九四九年起，美國國際收支開始有結餘，到了一九五七年以後，結餘數量逐漸增加。一直到一九五〇年代後半期，大多數國家均以積聚更多的美元外匯準備為急務。這時美國黃金存量無甚增減。但自一九五七年以後，許多國家改變作風。他們從所持有的貨幣準備中提出比較多的美元，用以兌換黃金，而增加貨幣準備中黃金的部份。這樣一來，美國的貨幣用黃金準備存量大為減少。從約二百三十餘億減少至約一百五十五億餘，約共減少了七十五億美元。但外人（包括外國中央銀行及政府以及普通銀行，商業機構和個人）所持美元仍有增加，從約一百四十億元增加至約二百一十五億元以上，約共達八十億之多。美國黃金準備繼續減少，而其對美元流動負債則有不斷擴張的形勢。這種形勢，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很可能發生美匯擠兌——持有美元的人們同時要求兌換黃金——的現象。

美國為減少黃金的外流以保護美元的穩定計，曾採取各種措施，或由美國單獨執行，或藉國際合作的共同努力，頗收效果（有關

美國政府保護美元的措施，請參閱本刊第三卷第三期楊承厚著「美國保衛美元措施的透視」一文。於此有一個矛盾現象：國際貨幣準備「外匯」部份增加，原是由於美國國際收支絀餘（赤字）的增加。這個赤字的增加，使美國國外「美元負債」與國內黃金存量的比率日形增大。這個事實已構成國際貨幣不穩的現象，有如上述。然而一旦美國國際收支的赤字消滅以後，或轉變為盈餘時，世界其他各國準備在現在情形之下可能增加得太過遲緩，甚至可能銳減。因此，如何改善現制以謀國際貨幣準備的充分供給，便成為當前研究課題。

二

在沒有談到國際貨幣制度改革方案以前，當先概述國際貨幣基金對解決國際收入問題所負的任務。

國際貨幣基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各國貨幣制度合作的統一機構。它除促使大戰後國際貿易更加自由化，減少貿易和外匯管制外，尚有一極重要功能，即以基金資源通融各國國際收支。當一個會員國國際收支發生暫時不平衡，即有絀餘時，得向基金借提「外匯」。借提辦法，係以本國貨幣繳入，而提用他國貨幣。在正常情形之下，每年借提不得超過各該國攤額的百分之二十五，且在五年之內不得超過攤額的百分之二十五。當借提第一個百分之二十五時，基金不加以任何限制，因所提用的實係各該國所繳的黃金；但以後借提則比較困難，且不一定能達到最高限額。因為所要用到的不是任何國家貨幣，必須是國際收支有盈餘國家的貨幣。但基金所持這種貨幣的數量有限。換言之，在通常情形之下，基金資源尚未能充分利用。

國際貨幣基金全部資源究有多少呢？按照不列頓森林會議所訂基金協約的規定，凡參加基金的國家，當視其在國際貿易中所佔重要性，及其中央銀行或財政部所持有國際貨幣準備的多少，認繳一定數量的資金，以供基金運用。這個「攤額」的繳納，分為二部份。第一部份為黃金，佔攤額四分之一；第二部份為各國本國貨幣，

佔攤額的四分之三。基金現在所持有的現幣，共值一百五十八億美元。其中包括二十一億的黃金，三十一億的美幣，三十五億的英、法、荷、比、義、西德、加拿大、日本及瑞典等九大工業國國幣；其餘為其他會員國國幣。

基金資源的來源既係各國認繳攤額，故提高攤額，實是增加基金資源的唯一手段。一九五九年，各國攤額會普遍增加百分之五十。惟基金鑒於國際貿易量的增加，需要基金通融的可能性擴大，而攤額非俟一定時間後（五年後）無法提高，於是為未雨綢繆，應付緊急需要計，曾於一九六二年與十大工業國家（美、英、法、西德、比、荷、加拿大、日本、義大利及瑞典）訂特別借約，約定基金可向此十大國借款，共計六十億美元，以供會員國借提。（註：除原十大國外瑞士，現也允借值二億美元的瑞士法郎）。

三

近年來各國人士對於國際貨幣制度尤其國際貨幣準備供給問題，紛紛提出改革建議。主張各異，派別繁多。但綜合而論，約可分為四大類型：

- (一) 提高黃金價格。他們認為國際貨幣準備數量，因金價的提高，可以大增而不再受現存黃金量不能驟增的限制。
- (二) 自由升降匯率。他們認為各國國幣，應與黃金完全脫離關係，而讓匯率自由漲跌。這就是說，各國國幣不必按照固定比率兌換黃金，且也不必與美元外匯聯繫。外匯匯率，一任供需情形來決定。這樣所謂國際貨幣準備問題，便可以無形解決。
- (三) 改組國際貨幣基金，使成為國際中央銀行，實行採取集中準備制度。他們認為國際貨幣基金，應賦予創造信用的特權。這就是說，授權新制國際貨幣基金得在公開市場活動，或直接放款，以創造自己的信用，而供給各國所需的國際貨幣準備。
- (四) 維持固定匯率及美元黃金互相兌換的規制。他們認為現行國際貨幣制度，以黃金為各國貨幣單位價值的標準並以美元和黃金共同充作各國貨幣準備，實施以來，尚稱便利，故無大事改革的必

要。但爲顧及將來的需要，他們認爲應一面增加國際貨幣基金資源並擴大其利用；另一面創立一個以主要工業國的貨幣爲基礎的「準備單位」。這個又稱爲「混合貨幣準備制」。

以上四種中前兩者，一個主張恢復舊金本位制，一個採取完全自由變動匯率制，均係極端的主張，頗難獲多數人的重視。第三種以 Robert Triffin's 方案爲代表，學者討論最爲熱烈，但改革幅度過大，未能適應目前國際政治環境，故一時也不易被各國所採用。至於最後一種，可以 Edward M. Bernstein's 計劃爲代表，平實易行，極受重視，且已成爲十國集團小組研討的中心（註一）。本文因此願將該計劃主要内容，加以介紹如次。

註一：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美國財政部長代表十個會員國（美、英、法、義、西德、比、荷、瑞典、加拿大及日本）發表十國集團（The "Group of ten" Members of the Fund）協議六點。其要義摘述如下：參加各國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總裁，在檢討現行制度長期展望後，一致認爲現行貨幣制度的基本結構——建立在固定匯率及訂定金價之上的結構——作爲目前及未來措施之基礎，業已證明其價值。可是他們覺得，對於國際貨幣制度功能的展望及對於國際流動現幣的未來需要，作一澈底的研究是有益的工作。這種研究，應該特別注意國際貨幣準備及其補充的信用設施未來需要的性質及其或然數量——這個需要是指「依某一可能獲致的經濟成長率及在物價穩定環境中」，以達成高度經濟活動爲目的而有效執行的國民經濟政策範圍之內所發生的。這種研究也應審議並評定滿足上述需要的各種可能運用辦法。此十國集團聲明原文見：Summary Proceedings—Annual Meeting, 1963,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 285-6。

#### 四

貝恩斯坦 (Edward M. Bernstein) 在其所著國際貨幣準備實用方案 (A Practical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serves) 一文中 (註二)，認爲現行國際貨幣制度，以黃金、

國際貨幣制度與貝恩斯坦改進方案

外匯，及國際貨幣基金爲基石，實施以來，頗爲完善。我們無須放棄這個制度而代之以一個新制度——一個賦有創造準備信用的國際中央銀行制度；但必須承認現行制度確有需要改革的地方。

據他的估計一九六三年底，全世界各國（不包括共產集團在內。以下彷彿不再註明）的貨幣準備總額，不下六三〇億美元。其中黃金部份共約三九〇億，外匯部份約二四〇億（見附表一）。他認爲目前國際貨幣準備，尚無不充裕之虞。但將來國際貨幣準備的供給，可能不足以適應國際經濟擴展的需要。第一、因爲每年新出土的黃金及蘇俄集團出售的黃金，有一大部份將被私人所窖藏，不能完全充作貨幣準備之用。因此，黃金的供給可能不敷準備之需。比方說，最近三年半之內，各國黃金準備共增加約百分之三·九，平均每年僅增加百分之一·一。這個增加率，較諸國際貿易額的增加率小得多了。第二、因爲以美元爲貨幣準備主要補充來源的現象，今後難期繼續維持下去。近十年來，美元在各國貨幣準備總額中所占的比率相當龐大。比方說，自一九五三年迄一九六三年六月止，世界各國貨幣準備總額增加一三八億元，其中僅五五億爲黃金的增加，其餘八三億爲外匯的增加。這些外匯，實全部爲美元。這裏除顯示美元的比重相當大外（占百分之六〇以上），並顯出黃金的增加已趕不上總準備需要的增加。可是，美國今後將不能坐視其對美元負債繼續增加，同時讓其本國黃金準備日形減少。最近數年來，美國政府會採取各種措施以求其國際收支的平衡。一旦美國國際收支回復均衡以後，則以美元作爲國際貨幣準備的主要來源的制度，恐怕不易維持。換言之，外匯準備的供給，將來也不能專靠大量美元的增加。

他根據上述的分析，認爲爲了確保國際貨幣準備的適量增加，必須使基金的資源與會員國營運準備打成一片。因此，他一方面主張增加基金資源並保證各會員國能够把他們繳入基金的攤額視爲他們的貨幣準備的一部份；一方面建議以主要國家貨幣爲基礎（資產）建立一種「準備單位」。

附表一  
各國官方持有黃金及外匯準備總額 單位：百萬美元



年 底	黃 金	外 匯	合 計
一九五一	三三、九二五	一五、一五〇	四九、〇七五
一九五二	三三、九〇〇	一五、六六五	四九、五六五
一九五三	三四、三二〇	一七、一七〇	五一、四九〇
一九五四	三四、九五〇	一八、二八五	五三、二三五
一九五五	三五、四一〇	一八、八四五	五四、二五五
一九五六	三六、〇五五	一九、八三〇	五五、八八五
一九五七	三七、三〇五	一九、〇一五	五六、三二〇
一九五八	三八、〇三〇	一九、二八〇	五七、三一〇
一九五九	三七、八八〇	一九、二〇五	五七、〇八五
一九六〇	三八、〇三〇	二一、八三五	五九、八六五
一九六一	三八、八五五	二二、四五五	六一、三一〇
一九六二	三九、二三〇	二二、五四五	六一、七七五
一九六三	三九、三五〇	二三、九七〇	六三、三二〇
六月底估計			

原 註：①所謂各國不包括共產集團在內。同時本表所列也不包括國際貨幣基金，國際清算銀行，及歐洲基金等所持準備

②1959年黃金準備的減少，由於基金攤額增加，其中一部份係為歐洲支付同盟的結束及因此而結清債權債務的結果。

資料來源：原載：A Practical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serves 'by Edward M. Bernstein in Quarterly Review and Investment Survey, 4th Quarter, 1963.

本表引自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美國國會 Hearings, 頁525。

### 一、提高基金攤額普遍利用。

他認為如國際貨幣基金能保證會員國可以利用攤額達於規定的限度，則各會員國便可把他們所繳存於基金的資金包括在各該國貨幣準備的總額中。這就是說，會員國在普通情形之下，當可向基金借提外匯，以調整國際收支。據

他所知：截至一九六三年九月底，只有四十八個國家，曾向基金借提共約七〇億元的外匯，其中五三億元，業已償還。此外，尚有許多國家，尤其美國和英國尚未會行使他們的借提權。這一現象，應加改善。又目前借提權的使用，對於國際收支細餘的國家，頗受限制。一般說，其中百分之七十五是絕對可以提支的，另外百分之二十五所謂「黃金轉移支付」是有完全保障的。可是會員借提每年不得超過攤額的百分之二十五，而一次比一次困難。因為借提者要受嚴格的「收支平衡」的考驗。一旦達於攤額的百分之二百的限度時，在通常情形之下，則不能再向基金求援。會員國運用基金資源的另一方式，是為備提協定。自實行迄一九六三年九月底止，備提金額共達七四億元，其中尚有一八億仍然有效。他建議基金對於會員借提者付「利息」的規定可以稍為放寬，以鼓勵會員國的運用，會員國還債期限，原定自第四年起即行開始，他認為應予放寬一年，即從第五年起開始。這樣可使借提超過了百分之一百的國家，有一個比較寬裕的時間來調整支付能力。

他認為基金所現持有某些所謂「關鍵」貨幣，為數有限，不敷運用。一般說來，比、法、西德、義、荷、瑞典、日本及加拿大等國的攤額，實在太少，不足以反映各該國國際貿易及國際收支所處地位的重要。結果，基金的流動現幣（或稱流動性或稱流動能力）未能達到它所應持有的數額。因此，他認為目前急需採取的行動，與其普遍增加全體會員國攤額以增大借提權利，毋寧增加上述各國的攤額而使基金能有更多的這些國家貨幣，以資運用。關於普遍增加攤額方面，他主張今後政策，不應再在相隔很久之後才來全部大量增加一次，實應每隔五年左右即酌量稍予增加一次。一九五九下半年至一九六三年上半年四年間，為貨幣準備增加超過平均增加的一個時期。這個期間內，各國（除共產集團外）黃金與外匯準備增加約百分之十四。除了上述少數國家攤額的增加，應比這個平均數多些外，其他各國攤額可普遍增加百分之十五。如是，將可維持基金資源對其會員國貨幣準備的原來的比重關係。這個普遍增加的措施，他希望能於今年（一九六四年）在東京舉行的年會中有所決定。他相信如基金的借提及償還政策依照上述建議加以改善，則基

金資源可能變成會員國營運準備的重要的一部份，對於貨幣準備充足與否的疑慮可以澄清。

## 二、建立「準備單位」擴大基礎

他建議應由十一個工業大國同意建立一種「準備單位」。這個單位的價值與金元一元相等。每一單位由十一大國通貨依一定比率組成。比方，準備單位一元可能含美元五角，其餘五角由英鎊、法郎、馬克、里拉、加拿大元、日圓及荷盾等湊足。組成比率視各國現在國際準備貨幣及其在國際貿易及投資所佔地位的比重而協議訂定。各國現持有準備數量，不問其成份為何，也作為考慮的一個因素。

今後參加各國所需貨幣準備，可任意以黃金、外匯，及準備單位充數。黃金準備與準備單位之間必須有一最低百分比。最終目標為準備單位數量等於所持黃金準備二分之一。至於各國所持外匯多少，不受持有準備單位多少的限制。準備單位的創造與持有，將可使國際貨幣準備增加。但此一計劃的實施，應分期推行。比方開始的時候，可能創造只需三五億元準備單位，參加各國每持有一元準備單位，必須同時持有九元黃金。

準備單位的創造，開始時，當由各國以等於所應持有的準備單位數量的本國通貨，繳存於國際貨幣基金。後者以信託人身份加以保管。比方說，美國應將一七億美元繳存基金，此數約等於三五億元準備單位的百分之五十弱。其他各國亦應按事先商定的百分比以本國通貨繳納。國際貨幣基金收存各國所繳通貨後，即在各國帳上記入同數的準備單位。這樣，一方面國際貨幣基金持有三五億元的十一國通貨，另一方面各國同時持有三五億元的準備單位。如同在其他場合一樣，基金所持的各國通貨如貶值的話，應享有政府負責補償的保證。

參加各國，對於其他國家金融當局所持本國通貨，負有兌換成黃金與準備單位的責任。每次兌換應含有準備單位多少應依事先議定的比率，並循國際貨幣基金的協約第八條第四款的規定辦理。比方說，在開始的時候，各國金融當局所持有他國通貨當可免取百分之九十的黃金和百分之十的準備單位。這個比率，應逐漸提高，到了後期，兌換率應為三分之二黃金三分之一準備單位。這樣可能

建立起一種由黃金與準備單位合成的混合本位制度。

爲了補償那些以真實資源（包括主要資產）轉移他國而接受準備單位結清差額的國家起見，凡參加此一制度的國家，對於該國繳存信託人（基金）的本國通貨，應給予百分之二的費用。信託人（基金）對於持有準備單位的各國，應給予百分之二的利息。準備單位存款所獲利息，當比參加各國國內金融市場所能獲得的利息爲低。這是合理的。因爲準備單位的持有，其安全性較高而且這一計劃實施之後，各國均霑利益。

這麼一種計劃的實施，對於現行國際貨幣制度，無需重大的變動。黃金仍然是各國通貨單位價值的標準。準備單位有一固定的金值。各國官方所持有的其他會員國家的通貨仍然可以兌換黃金，只是必須同時兌換準備單位而已。在這個制度之下，十一個參加國家的貨幣準備，可以不受貨幣用黃金不足的限制，而可能繼續增加。最後，這個制度可使參加各國貨幣準備中黃金與外匯比率趨於平衡，且同時提供一種辦法可使這十一國分擔適度的供給外匯準備的責任。

以上係貝恩斯坦改進方案的主要內容。

註二：本段係摘述貝恩斯坦所著 *A Practical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serves*, Published in the Quarterly Review and Investment Survey, 4th Quarter, 1963, a Publication of Modol, Roland & Co. N. Y., N. Y. 該文被轉載於 *The U.S. Balance of Payments Hearings before the Point Economic Committee, U.S. Congress, 88th Cong., 1st Sess., November 12-5, 1963, Washington: Supt. Docs., 1963. P. 525.*

附記：上文會說，貝恩斯坦方案，成爲十國集團研討中心。據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本年八月十五日報導，該十國集團小組的研究報告業已脫稿，除一致認爲目前國際流動現幣並無短絀現象，惟爲顧及未來需要計仍須繼續加以研究外，因美英二國與法荷二國意見相距太遠，對於提高攤額以及「混合準備單位」等辦法，均未能達成協議。



# 共匪所謂培養革命接班人問題之分析

張敬文

毛匪澤東提出培養革命接班人問題，具有三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作為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一種理論，打擊黑魯曉夫及其修正主義；第二個目的是作為一個政治號召，爭取大陸青年對匪偽政權的支持和緩和大陸青年對匪偽政權的不滿；第三個目的是作為匪黨的一項重大決策，在匪黨和黨外發起一個大規模的整肅運動，清算一切反共反毛力量，以鞏固其搖搖欲墜的個人獨裁統治。本文對這三個目的，都作了扼要的分析。

先從共匪發表「關於黑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說起。

目前毛匪澤東和黑魯曉夫個人之間的權力鬥爭，已經發展為一場全面的理論鬥爭。在這一鬥爭中，毛匪澤東顯然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若干重大理論問題上系統地提出他的意見，以取得國際共產黨的支持，並進而以這種意見來指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現在我們看到，毛匪澤東為了打擊黑魯曉夫，在「關於黑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那篇長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怎樣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並就這一個問題提出一系列的理論和政策，而「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便是這一系列的理論和政策的一個中心論點。下面我們不妨引證兩段話，來說明毛匪澤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毛澤東同志提出，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問題，從根本上說，就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不是後繼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後代能不能沿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

「培養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這一個口號並不是共匪在最近才提出來的，但是却直到最近才突出地顯出它的重要意義。這是因為第一、共匪在六月十一日至二十九日召開了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大會上把「培養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作為對大陸青年的一個政治號召；第二、共匪在七月十四日通過「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黑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篇長文，在這篇長文中，作為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一項重大理論和政策，以毛匪澤東的名義，提出了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並且在其後認為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一個重大發展」；第三、匪黨中央根據毛匪澤東的提議，已經作出了有計劃地選擇、培養、造就各級領導核心的決定，為此並在八月四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社論。共匪既然這樣重視所謂培養革命接班人問題，那末我們就要看一看，共匪提出這一個問題，究竟具有怎樣的含義和作用。

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黑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我們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在作了上述的論述之後，共匪還提出了充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幾個必須具備的條件。這些條件是：第一、他們必須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第二、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第三、他們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第四、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範執行者；第五、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於自我批評精神，勇於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在提到上面五點的時候，共匪都攻擊了黑魯曉夫，說黑魯曉夫是掛着馬克思列寧主義招牌的修正主義者，是個人野心和陰謀家；說他在國內為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在國際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利益服務；還說他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專橫跋扈，不講道理，實行個人獨裁；而且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

在和黑魯曉夫鬥爭了幾年之後，毛匪澤東在這個時候提出培養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問題，是有其認識上和理論上的根據的。

首先，毛匪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歷史時期裏，人類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需要經歷五代十代乃至更長的時間，亦即須要一百年乃至幾百年的時間。這就是說，在這個歷史時期裏，單單完成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

其次，毛匪澤東認為，在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都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這是因為被推翻的階級總是不甘心滅亡，總是企圖

復辟。因此在這一整個歷史時期，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為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條件。

再次，毛匪澤東認為，以美國為首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正在採取一種「和平演變」的戰略，這一戰略的主要內容，便是通過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使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逐漸蛻化變質，逐步走上修正主義的道路。現在南斯拉夫已經實現了資本主義復辟，蘇俄在黑魯曉夫的修正主義的領導下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危險，便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實施這一戰略的結果。為此，美國亦就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

最後，毛匪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前途，不是一個，而是兩個。這就是說，假定黨和國家的領導是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家的手裏，那末它的前途，便是共產主義的前途；反之，如果黨和國家的領導是掌握在修正主義者的手裏，那末它的前途便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前途。因此，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就必須解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問題。因為只有在這個問題解決之後，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家對黨和國家的領導才能得到保證。

這樣說來，毛匪澤東提出所謂「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問題，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角度來說，實在是一個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的問題，這就無怪共匪自我吹噓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一個重大發展」了。

### 三

毛匪澤東提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問題，除了在當前的匪俄鬥爭中具有理論的意義以外，對內還具有實際的意義。這種實際的意義的最明白的表現之一，便是這一個口號對大陸一億三千萬青年正起着一種刺激、誘惑和麻醉的作用。

大家知道，目前匪偽政權和大陸廣大青年的關係，是十分惡劣的，這是因為今天大陸青年所面對的各種切身的問題，共匪都不能提出有效的解決辦法，引起大陸青年極大的不滿。拿婚姻問題來說

，現在共匪因為感到人口的壓力，向大陸青年提出「遲戀愛，晚結婚」的要求，這在精神和生活上對大陸青年不能不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拿升學問題來說，目前大陸初中畢業生和高中畢業生的升學率從最好的地方估計只能達到百分之三十，而共匪為那些不能升學的青年所能安排的出路只有下鄉從事農業生產、支援邊區（仍然是從事農業生產）和在工廠或服務行業充當學徒三條，這就使得大陸上的失學青年無不感到個人前途茫茫，毫無出路。至於能夠從大學畢業的青年，則必須在工作上服從共匪的統一分配，而他們的工作崗位不是在基層，就是在邊區，因而他們的出路亦就比那些失學的青年好不了多少。在這種情形下，所謂社會主義的遠大理想，對大陸青年已經完全失去吸引力，相反的他們只熱衷於追求愛情的幸福，追求小家庭的溫暖和追求一些最起碼的物質享受，因為這種愛情的幸福、小家庭的溫暖和最起碼的物質享受，對別的國家的青年來說只是一種最基本的需要，而對大陸青年來說却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大陸青年的這種思想傾向，本來是很尋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共匪却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勢力和資產階級思想在大陸青年中傳播它的影響的結果，從而肯定青年中必定會出現一些新的資產階級份子和修正主義份子，這些新的資產階級份子和修正主義份子有一部份甚至還混進共產主義青年團裏面來，從青年團內部起着腐蝕和破壞的作用。胡匪克實在匪青年團第九次代表大會所作的修改團章的報告中供認：「在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已經揭露出團內確有極少數壞份子、階級異己份子、新的資產階級份子和蛻化變質份子。我們必須同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把他們清除出去。」可以說明這一點。以上的分析，說明今天大陸上的青年問題，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這一個問題如果不能解決，對匪偽政權的存在就會形成極大的威脅。但是共匪是無法從實際方面來解決這一個問題的。這樣，共匪就採取了它習用的方法，企圖從政治和思想方面來解決這一個問題。而所謂「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這個口號就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之下被強調提出來了。

共匪這次召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九次代表大會，一共提出三個中心口號，除了「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以外，還有「青

年革命化」和「學習毛澤東思想」兩個口號，而這三個口號是互相關連的。現在大陸絕大部份青年都感到個人沒有前途，沒有出路，共匪提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口號，便是告訴大陸青年，你們是有前途有出路的，不但有前途有出路，而且有很好的前途，很好的出路，這個很好的前途和很好的出路便是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但是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有條件的，不是無條件的，一個最基本的條件便是自己革命化，因此共匪又提出「青年革命化」的口號。不過一個青年怎樣才能使自己革命化呢？關於這一點，共匪提出的要求當然很多，如參加階級鬥爭，參加體力勞動等等，但最重要的一點，則是「學習毛澤東的思想，聽毛澤東的話，照毛澤東的指示辦事」。換句話說，便是做毛匪澤東個人馴服的工具，因此共匪又提出「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口號，並且在新修訂的青年團團章中明確規定以「毛澤東思想」作為青年團的指導思想。除此之外，共匪還在這一次的代表大會中，提出培養青年幹部問題，同時根據這一個原則，在新的團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中，選出一批新的年青幹部充當中央委員。凡此種種，都說明共匪企圖以新的政治號召，爭取大陸青年對匪偽政權的支持和緩和大陸青年對匪偽政權的不滿。因此我們說，共匪這一個「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口號，對大陸青年正起着刺激、誘惑和麻醉的作用。

但是共匪提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口號，在大陸青年中究竟能收到怎樣的效果，是很成問題的。第一、共匪對大陸人民和大陸青年提出的政治號召，十五年來不知有過多少次，但每次證明都是騙局，現在大陸人民和大陸青年已經對共匪不存着任何信任，因此共匪的這一次政治號召，也就很難獲得大陸青年的熱烈反應；第二、共匪所要求於大陸青年的，是做一個「完全為人，毫不為己」的所謂雷鋒式的人物，這是強人之所難，是完全不近人情的，而凡是不近人情的，就一定不會有什麼結果；第三、今天大陸青年要求共匪解決的是一些切身問題和實際問題，切身問題和實際問題不能解決，政治號召就變成了空話。雖然如此，共匪這一口號對於大陸青年所能產生的實際影響，仍然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 四

共匪的「關於黑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是在七月十四日發表的。接着八月三日，匪人民日報又發表了題為「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社論，就如何培養和造就革命接班人作了具體詳細的論述。這樣，這一個原來只表現為如何教育和培養年青的一代的問題，就發展或為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問題，即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又發展成爲匪黨當前的一項重要政策。因此在論述了共匪如何運用這一政策來解決大陸青年問題之後，我們還要看看共匪如何運用這一政策來防止資本主義在大陸的復辟。

今天毛匪澤東在大陸內部所面對的兩個基本問題：第一、是反共問題；第二、是反毛問題。反共問題，在共匪竊據大陸的第一天起，就已經存在；但是反毛問題，則是在黑毛鬥爭尖銳化和表面化之後，才開始出現，而現在這兩個問題，對毛匪澤東來說，已經成爲一個問題，即所謂資本主義復辟問題。爲了解決這個問題，毛匪澤東現在正進行着兩種鬥爭；一種是思想鬥爭，另一種是組織鬥爭。毛匪澤東說，隨着革命更廣泛的發展，「必須重新教育幹部、重新整頓革命隊伍」，所謂重新教育幹部，指的便是思想鬥爭，所謂重新整頓革命隊伍，指的便是組織鬥爭。說得具體一點，毛匪所進行的思想鬥爭，就是用「毛澤東思想」來對抗一切反共反毛思想（在這裏，可以把修正主義看作反毛思想），爲此他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學習「毛澤東思想」；毛匪所進行的組織鬥爭，就要在黨和政權的各級組織發動一個大規模的整肅運動，清算一切反共反毛勢力，而所謂選擇、培養、造就革命接班人，便是用來推進這一個整肅運動的一個漂亮的口號。

毛匪怎樣推進他的整肅運動，我們雖然所知不多。但是毛匪爲選擇、培養、造就革命接班人所製訂的各項原則，依據八月三日「人民日報」社論的論述，即可歸納爲下列幾條：

(一)「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一般地說，就是培養能够一代一代堅持無產階級事業的強大隊伍，特別是培養能够一代一代領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核心」(這個「黨和國家

共匪所謂培養革命接班人問題之分析

的各級領導核心」等字樣，是八月三日的社論第一次提出來的)。

(二)根據共產主義運動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教訓，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必須具備上文所提到的五個條件。

(三)「爲了切實按照五個條件挑選各級領導核心的革命接班人，必須特別注意貫徹執行黨的階級路線，選擇和培養的重點應當是先進的工人、貧農、下中農出身的幹部。」

(四)「按照五個條件選擇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還必須注意在激烈的、複雜的階級鬥爭中進行長期的考察和識別。」

(五)「在選擇、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方面，黨和國家的領導核心，特別是第一把手，擔負着重大的任務。」(所謂第一把手，在黨的方面，指的是第一書記)。

(六)「各戰線、各部門、各地區、各企業事業單位、各公社、各機關、各學校，一定要從上到地下、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一切工作的安排，都要有利於培養革命隊伍特別是各級領導核心的革命接班人。」(以上所引，均見八月三日匪人民日報社論)

從以上六點，我們對於當前毛匪所推行的整肅運動，可以獲得下面幾個概念：

第一、毛匪這一次的整肅運動，係以整頓各級領導核心爲中心。

第二、毛匪這一次的整肅運動，是全面的，其範圍包括一切地區和一切部門。

第三、毛匪這一次的整肅運動，係以所謂修正主義份子、資產階級份子、脫化變質份子和貪污腐化份子爲對象，而在實際上則是包括一切反共和反毛的人。

毛匪澤東在受到內外的強大壓力之下，提出培養接班人問題，對外是要打擊黑魯曉夫的修正主義，爭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對內是要鎮壓一切反共反毛力量，鞏固其搖搖欲墜的個人獨裁統治。但是毛匪以行將就木之年，才發現修正主義的力量是如此強大，發現社會主義的徹底勝利，不是一代兩代的事情，而是需要經歷五代十代甚至更長的時間，而痛感到「時不我與」，從而發爲「培養革命接班人」的叫喊，這不正是歷史上一切狂妄者的悲哀嗎？

# 蘇俄本年農業蠶測

呂律

(32)

三三

## 壹

在談到本文的主題之前，下列一些極具參考價值的要點，有為讀者先行一述的必要。

首先，從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五年的七年計劃，是黑魯曉夫上台以後所打出的王牌之一，是大規模開展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建設的第一步，它的成敗利鈍，對最近十年（一九六一—一九七〇）和最近二十年（一九六一—一九八〇）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并且超過美國，具體實現黑魯另一張王牌——俄共新綱領——的構想，最後表現共產主義的經濟比資本主義的經濟優越，不用戰爭就戰勝資本主義世界，具有舉足輕重的決定性作用。

其次，七年計劃，並不單純是一個工業計劃，一九五九—一九六五年的工業，即使一如蘇俄當局所宣傳的照原定計劃做到了，那祇能說是蘇俄的工業計劃完成了，工業計劃的完成，並不就代表七年計劃完成。整個的七年計劃，是蘇俄國民經濟各部門的一個總體計劃，任何一個部門的成功，不能代表七年計劃總體的成功，但任何一個部門的失敗，都能導致七年計劃總體的失敗。

農業，是七年計劃中一個組成部份，也是僅次於工業的一個主要組成部份。雖然黑魯曉夫強調說，沒有發達的農業，沒有豐裕的農產品，要實現共產主義是不可思議的，但事實表明，七年計劃的農業自一開始即是失敗的。一九六四年是七年計劃的第六個農業年，假如這一年的農業，再沿着以往五年的軌跡走向失敗，則不但七年計劃的整個農業計劃已無可救藥，在這種情形之下，蘇俄當局勢必再拿五億以上美元的黃金儲備去買一千多萬噸的小麥，而國民經

濟其他部門因為投資再一次被抽調，勢必隨之而告破產，也就是七年計劃整個陷於破產。

自一九五四年大舉開墾生荒地與熟荒地之後，在蘇俄農業中具有決定地位的地區，已不是南部和中部，而是東部，也就是說，素稱蘇俄麵包籃的烏克蘭已從第一位降到第三位，而俄羅斯共和國和哈薩克共和國分享第一和第二的高位，這兩個地區的年成好，就是豐年；否則，就是荒年。紀錄表明，自大舉墾荒以後，在過去的十年中，祇有一九五八年是個豐年，其餘差不多都是歉收之年，這就是因為一九五八年東部地區的農業出現一個奇蹟，而以後各年，并未作同樣的繼續。

蘇俄每年的收穫期，分為夏秋兩季：夏收，在蘇俄農業中所佔的比重不大，這一次的收成主要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外高加索幾個以秋季作物為主的地區；秋收，是蘇俄農業主要的希望，每年從七月到十一月的五個月期間，是蘇俄全國各地的收穫季節，就是眼前這個時期，正是秋收中的「狂熱」時期，從南到北，從西到東，到處都為刈穀、打穀、運穀、售穀忙成一團。不過經驗表明，不但田裏的莊稼不能算作真正的糧食，即連已經割下來的、已經經過打穀、運穀、售穀各個程序的穀物，在未歸倉以前，一概不能算作真正的糧食。蘇俄的農業品統計以入倉量為標準，其道理在此。

過去五年的農業歉收，不能完全歸咎於氣候條件，人為的條件也要負一半責任。就氣候條件而言：一連五年，春季都來的很遲，使播種工作來不及在所餘無幾的時間內從容完成；夏季莊稼需要雨水的時候，往往遇到亢旱，以致禾苗因缺乏水份而告枯萎；到秋季收割的時候，往往遇到連綿不輟的秋雨和早期降臨的霜雪，以致已



割下的和未割的莊稼被雪封在田裏，不能作實際的享用。就人爲的條件而言：首先是收割技術的修理跟不上客觀要求，計劃上的全部技術不能整個用到田地上，以致每年都有未割的莊稼留在田中，毀於霜雪；其次是運輸工具的調配，很難同田間和打穀場上的工作協調一致，往往發生有穀無法歸倉的現象，一遇雨雪下降，即遭霉爛；第三是穀倉的容量不够和分佈的位置不宜，以致發生在倉庫的空地上、火車的轉運站上、汽車運輸的道路上、打穀場上都有大堆小堆的露天穀物，祇好任令雨雪摧殘，不能變爲真正的糧食。

總之，要保證一九六四年的農業不重蹈以往五年的覆轍，在氣候條件方面，必須有一個不早不晚的春天、不旱不澇的夏天和無雨無雪的秋天，在人爲的條件方面，必須及時的將全部技術修好，掃數用到田地上，運輸工具調配得當，穀倉配置適宜；在地區方面，必須是東部的年成比以往五年好，同時由於一九六四年的農業完成了計劃任務，不但使蘇俄當局在國民經濟投資方面減輕負擔，不再採取剝肉補瘡的辦法，而且保證七年計劃雖不完全成功也不澈底失敗，爲趕上并且超過美國的目標留一餘地。

## 貳

蘇俄一九六四年的農業究竟如何？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可以得自黑魯曉夫最近的言論和活動。

我們知道，七月十三日黑魯曉夫曾在最高蘇維埃大會提出「關於完成俄共綱領提高人民福利方面各項措施」的報告，宣佈自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實行集體農民退休金和補助金的法案，這無異是同農民在講條件，用未來的口惠換取今年的收成。最高蘇維埃大會閉幕不久，在八月四—十八日的半個月期間他又作了一次農業旅行。他到過：俄羅斯共和國和薩拉托夫、伏爾加格勒、羅斯托夫三個省，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阿第蓋自治省），北奧謝蒂亞、韃靼、巴什吉爾三個自治共和國；哈薩克共和國和庫斯坦奈、柴林諾格勒二個省；吉爾吉斯共和國的伏龍芝。每到一處，除儘量參觀集體農場、國營農場、實驗基地外，或在歡迎會上發表有關一般性的及針

對當地農業實際情況的演說，或舉行農業座談會，廣泛交換改進農業的意見和完成本年秋收的辦法。他對本年農業的關切之情，於此可見一斑。

黑魯曉夫最近十年，每年至少作一次農業性的巡視，這些巡視的紀錄告訴我們，在東部地區接近秋收邊緣的時候，他作如此廣泛的農業旅行，今年尚屬首次。所以然者，表面上的理由如他在柴林諾格勒發表演說時所說，俄共中央定於本年十一月舉行全會，討論「農業專業化」和「實現黨集約化方針的農業領導」問題，爲了使他屆時作出一個出色的報告，所以先作一個實地考察，發現一些問題，以謀改進；實際上，他在最高蘇維埃報告集體農民退休金和補助金法案時，已有所透露，即：

一、本年的春季到來又是相當晚，而且情況很複雜；  
二、一些個別地區，如白俄羅斯、烏克蘭沿森林地帶和森林草原地帶、西北地區許多省，今年在播種穀物、亞麻及其他某些作物的時候，遇到乾旱的氣候；

三、莫斯科、加列寧兩省及所謂十分濕潤地帶的其他省份，今年亦不能保證不發生乾旱的情況。

儘管如此，據黑魯曉夫在最高蘇維埃大會舉行之前所接各地農情報告及他本人親自下鄉巡視所見，認爲一切顯示今年這個農業年應該是良好的。他樂觀的說，蘇俄農村正在創設一些實際可能性，在今年收到的糧食，足以完成穀物採購計劃，而且有許多地區甚至要超過這個計劃，充分滿足國家對於糧食的需要，并儲存一批數目可觀的糧食。

黑魯曉夫此項樂觀的展望，很可能是實際可能性與政治宣傳作用各佔一半。我們目前雖然未便加以懸揣今年的蘇俄農業將得到一個什麼樣的具體結果，但是我們敢於說黑魔此項樂觀的展望缺乏實際有力的支持。

首先，我們知道，本年的春季作物是在春暖到來相當遲的情況下播下去的，這在先天條件方面已爲本年的收成留下一個發育不良的因素；夏季是不是缺雨，黑魔在幾個場合裏的言詞都相當閃爍；至於開始收割以後是不是一反往年遇到一個無雨無雪的氣候，誰也

無此把握。黑魯曉夫自己也在說，蘇俄的科學還未到能够控制氣候的程度。

其次，秋收準備工作中的技術修理和人力調配，照例一團糟，今年也未必會出現奇蹟比往年搞得更好。我們細味黑魯曉夫在最高蘇維埃大會報告時所說的：「應該指出的是，由於春天到的晚，新墾地邊疆區和東部其他地區，在收割之前，必須妥當的準備人、準備技術，認真的組織收割工作，以便光榮的贏得這一場負責的考驗，用新的勝利來使祖國感到快樂……」從這裏我們已得一種暗示，本年的人力調配和技術修理亦非秋收勝利的支柱。

黑魯曉夫對於本年秋收作了兩大改進：其一是往年每屆秋收，照例由全國各地調撥大批運輸汽車開往東部協助農產品的運輸工作，以致發生種種脫節的浪費現象，本年決定不再採用；其二是往年穀倉的建築地點，多配置在鐵路沿線，而且容量有限，以致距離較遠的農場怨言載道，損失巨大，本年決定，凡距離穀倉較遠的農場，得就地建立臨時農倉，以節省人力物力，同時可避免運輸的損失。此其改革，驟然視之似乎具有進步意味，但進一步分析，其流弊恐怕比過去的辦法更糟。過去的經驗表明，每屆秋收由各地調配大量運輸工具，猶感收穫過程中各階段的運輸工作與收割進度不能配合，於今不論距離國家穀倉遠近之農場，一律靠當地現有的運輸工具，其捉襟見肘一團糟之情況不難想像得之；其次，距離國家穀倉較遠的農場就地建立臨時倉儲，雖可免去運轉之麻煩與巨大的耗損，但倉儲化整為零的搭建、管理費用為數可觀，尤其照黑魯曉夫指示，此種臨時倉儲在春耕之前要運到國家穀倉存儲，由此看來，這不過將運穀工作延緩，而運輸中必不免的損失移後一步而已。所以，黑魯曉夫對於本年農業所作的樂觀展望，最多是一個自欺欺人的浮腫狀態，用臨時倉儲的辦法造成一個好看的虛偽的入倉量，其必不可免的種種損失則避而不談。

### 叁

黑魯曉夫最近所發表的一連串有關農業的言論，有三大顯明特

點，這可能是本年農業生產方面的反映，同時也可能是他在十一月俄共中央全會上報告的一些要點。

第一個特點，他最近已不像前幾個月張口就是農業集約化和礦質肥料了，代替這些的是他最新的一個口頭禪——農業文化。他認為提高農業文化，是當前農業中最主要的一個問題。何謂農業文化？關於這一點，他在庫斯坦奈省和柴林諾格勒省演說時，都作過詳細的闡述，歸納起來大致為以下各點：

一、所謂農業文化，是適用於蘇俄國內每一個地帶的具體概念。高度的農業文化，要有農作物的優良品種，爲了這一點要會組織種籽繁育（育種作業），迅速增加種籽，以之保證每一個農場。

二、高度的農業文化，應該使田間不生雜草。

三、在蘇俄的條件下，高度的農業文化要求作積儲水份的鬥爭，該應有一個機器體系，按各農場的條件決定中耕的作物。

四、與農業文化有關的，即農業文化最重要的要素，是有效的採用礦質肥料，利用當地的可能性發展灌溉。

他在柴林諾格勒演說時，甚至於這樣說：「農業文化不是用說話可以提高的，如果祇是呼籲農業文化，而不及時的從事秋耕；如果祇是談論與雜草鬥爭，而你的田裏已長滿了燕麥草，這還稱得起什麼農業文化呢？祇知道講農業文化，而不知道用什麼樣的種籽播種，不知這個地帶適於何種作物的品種，在我國有不少這樣的領導份子。」

第二個特點，他在本年二月間曾修正自己過去取消一切休耕地以擴大播種面積和普遍實行秋耕以縮短春播時間的錯誤，主張在應該有休耕地的地區可以保留二〇%的純休耕地（見本刊三卷八期拙作「評黑魯曉夫最近的經濟言論」），現在又作了反修正，他的理由是由休耕的辦法不如秋耕來得有利。據黑魯曉夫說，蘇俄農業方面的休耕地問題，目前不但是一個重要問題，而且是哄動一時的問題，一些學者專家正在討論如何使小麥的佈局更爲有利——採取純休耕，還是採取秋耕？黑魯曉夫對於這個問題，雖然胸有成竹，但故示民主作風，因此他頗爲巧妙的分爲四點說明他的意旨：

一、他說他從來沒有反對過、也不想反對純休耕地，如果證明



一、經採用在經濟上是合算的話。

二、他認為在決定純休耕與半休耕的時候，應當以經濟合理為出發點，如果就經濟方面純休耕是有利的，如果它可以提供更多的穀物，就過渡到純休耕；如果純休耕證明不合算，如果它提供的穀物較少，就應當過渡到半休耕上去。

三、有人說某一年純休耕地比秋耕地收到更高的收成，他認為這還是不能證明休耕地的優點，問題是休耕地兩年祇有一次收成，而秋耕在這個期間却收到兩次。他認為必須是休耕地所收的穀物超過兩次秋耕地的收成，這才能證明休耕地是優越的。因此他說：「我不能同意那些未經過經濟核算就斷定休耕地的小麥收成多於秋耕地的收成，於是就偏愛休耕。為了正確的決定休耕的問題，應該以經濟上有根據的立場對待之。確實確實，實踐證明純休耕地種的小麥收成多於秋耕，但是從這裏作出一項結論——過渡到休耕，這是正確的嗎？不，沒有正確的經濟核算而作這樣的結論是不可以的。」他更具體的說：「假如我是一個國營農場的場長，或分場主任，則我所持的立場是這樣的：如果休耕地的收成多於兩次秋耕，我就贊成休耕；如果休耕地的收成少於兩次秋耕，我就反對休耕。」

四、他對他最佩服的一位國營農場場長赫萬所說的「應該撥出若干土地作為休耕地，使土地得到休息」，表示不能同意。他認為蘇俄的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它們的土地應該講求恢復肥沃，而肥沃的恢復不能靠休息，應靠科學，靠化學，採用有機的和礦質的肥料。

第三個特點，他吸收西方各國農業經驗的傾向已愈來愈顯明了。總計在此次的農業旅行中，他所盛讚的西方農業文明，為以下四點：

一、不久以前他曾接見一位美國農場領導人范黎先生，使他所得到的的一個極為深刻的印象，是大規模養豬這件事愈來愈成爲一件工程師的事業。據范黎告訴他，在一間全盤機械化的廠裏，一年可以肥育二五萬口豬，每口重一〇〇公斤。同時像這樣一個附有配合飼料生產和屠宰車間的廠，祇需要一二六個人。每增一公斤豬的重量祇需三·五公斤的飼料。

蘇俄本年農業蠶測

二、他說，在莫斯科舉行的英國農業展覽會上，有人爲他講述養火雞的大型工廠，這些廠裏的火雞，每增一公斤雞肉祇需四公斤飼料，也就是穀物。展覽會上展出的火雞重二六公斤，可以有九〇%的肉。

三、他很羨慕丹麥的單位面積產量，他們那裏每一公頃穀物的平均產量爲四一公担。他說：「不錯，這個國家對於穀類作物具有理想的條件：他們那裏的氣候和暖雨量充足，但是主要的是丹麥人使用大量的礦質肥料。在這樣一個小國裏，把育種列到第一個計劃上，他們那裏的小農場，在私有資本主義經濟的條件下是這樣安排的：一些個別的農場育種，而以它們的種籽去保證其他的農場。」

四、關於與雜草鬥爭一事，數年前他曾與美國農場主人加爾斯特先生談過一次，此次他特將加爾斯特的話轉述一遍。加爾斯特說：每一種農作物都有其伴生的有害的東西，從前在人們發現他種的作物幾年之後生出此種有害的東西，就把這種作物種到另外的田地上，即離開這些有害的東西；現在不用這樣做了，因爲有了農藥和其他化學品了，藉助於這些東西可以把有害的東西予以消滅。加爾斯特又對他說：以前他種過三葉草和苜蓿，以便土壤裏得到更多的氮，因爲這些豆類作物產生這種物質；現在可以在店裏買到氮、磷和其他肥料，可以根據需要用到田地上，不必再種豆類作物了。加爾斯特補充說：從前他種豆類作物，另一方面是爲了平衡育牛的主要飼料——玉蜀黍裏面的蛋白質，現在不用這樣做了，因爲化學可以爲他增加蛋白質。

總而言之，黑魔此次農業旅行所發表的言論中，以上三個特點最引人注意，同時也造成一種印象，即黑魯曉夫犯了飢不擇食、得病濫投醫和搖擺不定的錯誤。我們可以想見，黑魔這種錯誤是根據一定的背景形成的，這種背景就是本年的秋收結果，看來是不會像他所說那樣的。國際間一般的印象是，黑魔是非常現實的一個人，假如說本年的秋收能像一九五八年那樣，或者甚至於像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那種情況，他的言論和行動就不會這樣，他所以如此作，是他對於今年的秋收比去年更爲關切之故。